

红旗

HONG QI

11

一九六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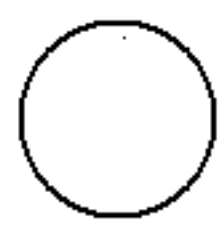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十一期 ★

目 录



发扬革命精神, 粉碎现代修正主义

——五月二日在雅加达群众大会上演说的摘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 迪·努·艾地 (1)

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南斯拉夫农业.....施东向 (6)

土地改革没有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一度实行的
农业集体化没有触动富农经济——代表富农阶级的利
益, “给农业中的经济力量以自由的道路”——农村两极
分化日益加剧的几个标志——如此“社会主义成分”——
结论是南斯拉夫农村的资本主义愈来愈泛滥

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必定胜利.....林文山 郑公盾 (23)

- | | | |
|--------|--|---------------------------------------|
| 书
评 | | 阶级斗争的生动教材
——读《红色堡垒》.....黄秋耘 (32) |
| | | 大写社会主义英雄谱
——读《武钢建设史话》.....宋 爽 (34) |

怎样理解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和实践标准?陶德麟 (37)

☆ 六月七日报出版 ☆



发 扬 革 命 精 神， 粉 碎 現 代 修 正 主 义

——五月二日在雅加达群众大会上演說的摘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 迪·努·艾地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五月二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說，詳細地論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論战和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意义。

这次集会是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召开的，有七千工人参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魯克曼、約多和苏蒂斯曼也参加了大会。

艾地说：“有些人問我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停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論战做了些什么。我的回答是，从一开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表示不同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公开論战。在公开論战发生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来制止它。”

艾地说：“苏联共产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发动了公开攻击。那时，苏联共产党要求我跟着他們攻击阿尔巴尼亚。我說：‘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认为在一个党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向其他兄弟党进行攻击，就会建立一个很坏的先例。这不是为了加强兄弟党之間的团结，而是为了分裂。由于在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其他兄弟党发动了攻击，于是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保加利亚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跟着做起来了。这就成了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表现。这是对莫斯科声明的違反。”

艾地说：“去年七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派遣了一个由我率領的代表团訪問苏联、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訪問苏联和中国。在我們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前几天，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后来，我們到了北京，会見了毛澤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等人。我当时表示希望，公开論战必須停止。中国同志對我們說，他們一向不同意展开公开論战，可是現在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既然有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如果他們不回信，那是既沒有礼貌、又不合理的。是的，同志們，問題确实是如此。要是你收到一封信而不予答复，这有礼貌嗎？当时，我根据正义感认为，中国同志必須加以答复。因此，在我們



回国后，我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公开论战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以科学的、讲理的态度和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式热烈进行，我们党应当把公开论战看成是一所免费的、世界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努力从中学习。”

艾地说：“从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对立的角度来看，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斗争的确尖锐。事情只能是这样，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总是彼此对立的，这种对立今后必将愈来愈尖锐。修正主义头子是顽固分子。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修正主义头子曾经悔悟过。修正主义者毕竟是修正主义者。在历史上，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者从来没有悔悟过。他们至死还是修正主义者。”

艾地说：“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回顾形势的时候，可以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正在一天天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正在向全世界扩展。

“在印度尼西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不仅是共产党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是一致反对修正主义的。除了共产党人之外，还有其他革命者反对修正主义。所有的革命者反对修正主义，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修正主义者要修改和歪曲的是革命本身。在革命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地区，是没有修正主义的市场的。

艾地说：“我们知道，修正主义者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愚蠢的。他们到处出洋相。在这里我号召我们的工人不要成为修正主义者，以免当傻瓜。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基本上说来，没有修正主义的市场。革命形势在继续不断发展。在拉丁美洲，有古巴和委内瑞拉。那里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古巴和委内瑞拉。在非洲，有桑给巴尔、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那里将出现越来越多的桑给巴尔、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在亚洲，有印度尼西亚和南越等。在这里，必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印度尼西亚和南越。在受古巴、委内瑞拉、桑给巴尔、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印度尼西亚和南越等鼓舞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没有修正主义者的市场。”

艾地说：“但是我们仍然必须保持警惕。这是因为修正主义者定将千方百计地挤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他们将竭力设法纠集一些人成立另一个所谓‘共产党’或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时存在。但是他们的丑恶面目将被彻底揭露。我们不当害怕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但是我们应当保持警惕，保持我们党的警惕、我们阶级的警惕以及我们国家的警惕。”

艾地说：“我们决不会宽恕修正主义者。我们对修正主义者关闭一切大门。这里最重要的是在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和亚洲的其余地方，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发扬革命精神。”

艾地说：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肿瘤。“它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反映，它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他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这



事实上是由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現代修正主义之間矛盾而发生的淘汰、明朗化和巩固过程的一种反映——要求工人階級必須認真学习和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使他們可以忠实地繼續完成他們的革命任务。尽管修正主义者接二連三地发动猖狂进攻，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仍然健全地屹立着，仍然忠于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印度尼西亚革命。”

艾地說，“去年举行的新兴力量运动会的經驗教导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和全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如果不与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进行，那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同对待帝国主义者一样，如果不去反抗現代修正主义者，他們将会变得无法无天，但是如果給予沉重打击，那末他們就会狼狽逃窜。在亚非工人會議筹备會議上和在世界工会联合会的讲坛上的經驗也是如此。关于反对現代修正主义不仅是共产党人的任务，而且是整个工人階級运动和全体进步人民的任务这一結論，是十分正确的，因为現代修正主义直接阻撓工人階級和进步人民粉碎帝国主义的斗争。”

艾地說，“現代修正主义者攻击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說我們是‘民族主义者’，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直在努力使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据修正主义者的看法，这是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們用这种罪名来攻击我們，这清楚地表明，他們已經拋棄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絕對必須同各国工人階級革命运动結合起来的原則，拋棄了工人階級‘必須根据欧洲各国所沒有的特殊情况’（列宁語）的原則。”

艾地說，現代修正主义者誣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忠于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原則。他說：“作为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支柱，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不仅是印度尼西亚社会的組成部分，而且还是强大的国际力量的一部分。因此，它除了为本国的利益进行斗争和为执行爱国任务而站在最前列以外，它同时还一貫地忠于自己的階級使命，忠于自己的国际使命。”他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实行国际主义决不違反民族使命，正相反，这同时也是一項民族使命，党实行爱国主义也是一項国际使命。”他又說，“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无产階級国际主义是同真正的爱国主义結合在一起的。”

艾地說，“現代修正主义者还不断攻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說我們加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国际革命战綫的活动是‘分裂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活动。这显然是誹謗。大家都知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反帝革命运动，是新兴力量的一部分。反帝斗争最高漲的恰恰就是在这些地区。同时，正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存在着各被压迫民族，他們正在为粉碎帝国主义及其合法的产儿种族歧視而进行生死斗争。种族主义只能存在于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中間，而在工人階級领导下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而斗争的人民中間，根本沒有种族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

艾地說：“总之，在新兴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偉大斗争中，印度尼西亚



亚工人阶级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继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巩固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团结，并且粉碎喜欢美化美帝国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

艾地在谈到反对“马来西亚”的斗争时说：“我们应该全力帮助北加里曼丹人民的解放斗争。”他说：“志愿人员运动在粉碎‘马来西亚’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威力。它把这场斗争引上了全面对抗斗争的道路——一条革命的道路。苏加诺总统指出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沿着它前进的这条道路是三种形式的斗争的结合，即：国内强大的反‘马来西亚’统一战线，在‘马来西亚’的强大的反‘马来西亚’统一战线和强大的反‘马来西亚’国际统一战线的结合。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对抗的道路是多么的现实和正确。”

艾地说：五一节前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以‘纳沙贡’为核心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在加强在亚洲和非洲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而斗争的国际力量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印度尼西亚人民，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工人的坚决斗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作为恪守政治上坚持主权、经济上自力更生和文化上保持民族特点的原则的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艾地说：“一致协议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是很重要的，因此这是对那些企图分裂亚非团结的人的一个答复。更加重要的是，人们迫切要求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以便广泛地巩固和发展亚非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革命精神鼓舞的桑给巴尔人民的革命，对于非洲大陆人民是一个生动的榜样。正像其他亚非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一样，桑给巴尔人民的革命应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日益高涨的斗争正在动摇和削弱帝国主义，最后将粉碎帝国主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认为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实际上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下，才能取得彻底胜利。列宁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国家和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只有那些已经抛棄了列宁学说的修正主义者才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和这个斗争的重要性熟视无睹。”

艾地接着谈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农民运动。他说，“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已经通过它的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农民结合起来。这样，工人阶级（主要通过共产党人）和农民的联盟已经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工农联盟的不断巩固，是巩固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条件。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反映在所有的革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的共同行动中，而且反映在诸如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阵线和作为革命的支柱的工农联盟这些具体形式中。所有这些，都不能同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分开，也不能



同农民願意在工人階級领导下参加民族和民主革命这一点分开。目前，农民为粉碎封建残余而采取的单方面行动的胜利，也就是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的胜利。这清楚地证明，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輝照耀下，即工人階級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农民斗争已經构成无产階級的强大力量，这使得农村內的魔鬼們大肆叫囂。修正主义者不願意看到我們在农民当中忙碌着，便誣蔑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經淪为农民党。讓他們去指手划脚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將繼續前进，同农民相結合。”

艾地說：“如果我把上面說过的話概括起来，并把它加上以粉碎‘馬来西亚’、粉碎‘农村惡魔’和粉碎修正主义的决心来庆祝五一节的标题，那么就可以看出，我同时也說明了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在当前民族解放斗争以及在印度尼西亚国家建設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在爭取彻底执行政治宣言和爭取建立一个完全独立和民主的印度尼西亚的斗争中不仅起了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还起了领导作用。”

艾地說：“为了爭取印度尼西亚国家建設的胜利，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运动，并不只是进行建立一个沒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和建立一个完全独立和民主的印度尼西亚的斗争，它还为一个沒有資本主义残余和人剝削人現象的社会主义的印度尼西亚而努力。”

他最后說：“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前的任务，是巩固工人統一战綫和繼續加强民族統一战綫，以便完成粉碎‘馬来西亚’，‘农村惡魔’和現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艾地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將繼續高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旗帜。我們认为，必須举行兄弟党之間的双边会談来解决他們之間的分歧，这是召开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的一个条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仍然认为，必須举行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間会的談，这是这两个党自己在去年七月的双边会談中决定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將繼續努力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这应当被认为是駕凌于一切之上的。”

艾地讲话后，大会一致通过了若干決議，强烈譴責美国的干涉和顛复活动，要求美国政府把第七舰队撤出印度洋。決議还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美国駐印度尼西亚大使琼斯为不受欢迎的人。決議表示支持苏加諾总统关于加紧进行粉碎“馬来西亚”的斗争的命令和表示决心拿起武器和增加生产。

決議还譴責巴西政变当局不顾世界輿論的譴責，繼續迫害巴西爱国人士和中国貿易人員和記者的法西斯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六日电】



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 南斯拉夫农业

施东向

南斯拉夫经济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蜕化，从一个方面，提供了否定的回答。农村资本主义的泛滥，从另一个方面，提供了否定的回答。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对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论证。在这以后，苏共领导继续为铁托集团辩护。但是，他们拿不出任何有力的事实，讲不出任何像样的道理，来证明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没有蜕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他们也拿不出任何有力的事实，讲不出任何像样的道理，来证明南斯拉夫农业不是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只好重弹老调，说什么现在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成分”，“在农业中不是百分之六，而已经是百分之十五”^①。

他们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自己编造的谎言堆里。我们再次奉劝他们，还是把头伸出来看一看南斯拉夫的历史和现实吧！看一看南斯拉夫农村，究竟是“社会主义阵地正在加强”，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愈来愈泛滥？

一 土地改革没有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南斯拉夫，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地主富农经济在农村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广大的劳动农民遭受着沉重的盘剥。

一九三一年，南斯拉夫农村的人口共有二百多万户，耕地面积共约一千万公顷。其中：

拥有耕地两公顷以下的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八，他们的耕地仅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六点五。

拥有耕地二公顷到五公顷的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四，他们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五。

拥有耕地五公顷到十公顷的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点五，他们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七。

拥有耕地十公顷到二十公顷的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点八，他们的耕地占全部

^① 苏斯洛夫 1964 年 2 月 14 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报告。



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三。

拥有耕地二十公頃到五十公頃的大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二点五，他們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三。

拥有耕地五十公頃以上的大农户或大庄园主，只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零点四，但是他們的耕地却占到了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九点七^①。

上述农户类别的资料说明，拥有耕地五公頃以下的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百分之六十七点八，他們的耕地只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二十八。拥有耕地二十公頃以上的大农户大庄园主，占农村总户数百分之二点九，他們却占有了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七。战前南斯拉夫农村，一小撮地主富农占有大量土地，广大贫苦农民占有少量土地的情况，两极分化的情况，是很明显的。

一直到現在，我們还没有看到铁托集团結合土地占有以及耕畜占有、农具占有、租佃关系、雇佣关系等各方面情况，具体分析农村阶级关系的系統材料。但是，从我們手头的一些零碎材料^②，可以看出，拥有耕地二公頃以下的农户和二公頃至五公頃的农户，絕大多数是贫农和雇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者和无产者。

随着两极分化的加剧，南斯拉夫贫农雇农的户数不断增加，一九三一年，占有二公頃以下土地的贫苦农户共七十一万一千户，十年后，即一九四一年，增至一百二十二万一千户^③。他們的少量土地日益丧失，耕地不足的情况愈来愈严重。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南斯拉夫农民群众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們在战争胜利后，迫切地要求推翻地主阶级的統治，解决土地問題。

一九四五年八月，南斯拉夫政府頒布了《土地改革和移民农垦法》。这项法令規定，总面积超过四十五公頃，或雇工耕种和出租耕地达二十五至三十五公頃的大地产，属于銀行、企业、股份公司、寺院以及其他世俗的或宗教的受捐贈成立的机构的地产，都全部沒收。这项

① 見《南斯拉夫的土地改革》，南斯拉夫出版社 1961 年俄文版。

② 这些材料是：

1. 瓦西奇的《南斯拉夫农业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貝尔格莱德劳动出版社 1960 年版）一书中說：拥有耕地二公頃以下的农户，沒有馬的占百分之八十六，沒有牛的占百分之六十一；拥有耕地二公頃到五公頃的农户，沒有馬的占百分之七十，沒有牛的占百分之四十四。

2. 斯巴索耶·梅德尼查的《作为經濟組織的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南斯拉夫文化出版社 1959 年版）一书中說：在土地少于一公頃的农户中，沒有农具的占百分之八十一；拥有一至二公頃土地的农户中，沒有农具的占百分之五十九；拥有二公頃至三公頃土地的农户中，沒有农具的占百分之四十一；拥有三至五公頃土地的农户中，沒有农具的占百分之二十七。

3. 据 1959 年 1 月号《南斯拉夫一覽》材料，拥有耕地五公頃以下的农户，一般都是雇农。

4. 据 1962 年 8 月 20 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材料，拥有耕地二公頃以下的农户，他們的货币收入，大約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在外做工获得的。

③ 科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問題》。見 1962 年第 5 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杂志。



法令还规定，没收超过最高限额（二十至三十五公顷）的多余耕地。

根据这个法令，在土地改革中没收的土地共计一百五十多万公顷，约占拥有二十公顷土地以上的大农户和大庄园主全部土地二百四十多万公顷的十分之六。这些没收的土地，只有一半直接分给贫苦农民和无地农民。到土地全部分配完毕的时候，一百几十万户占有二公顷以下土地的贫苦农户中，仅有三十一万六千户分得土地，平均每户分得二点五公顷。由此可见，贫苦农民耕地严重不足的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

不论从没收土地限额的规定，还是从土地分配的情况，都不难看出，铁托集团实行土地改革的出发点，不是充分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他们实行土地改革的路线，不是充分发动农民群众向地主阶级进行坚决斗争。因此，战后南斯拉夫实行土地改革的结果，不仅原封不动地保存了富农经济，而且实际上还保护了一部分封建经济。

二 一度实行的农业集体化没有触动富农经济

在土地改革以后，占南斯拉夫农村户数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贫农和雇农，要求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反对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要求走合作化的道路，实现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

铁托集团是怎样对待南斯拉夫农村进一步向前发展的这个问题呢？怎样对待广大农民的这个迫切要求呢？

他们不敢承认，土地改革以后，广大的贫农和雇农仍然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竭力掩盖富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仍然占据农村统治地位的事实；完全否认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的增长，和由此而产生的阶级斗争的加剧。

铁托集团虽然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先后颁布了一些关于合作化的法令，着手组织了一些农民劳动合作社，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没有丝毫触动富农经济，并且一再号召不要同富农进行阶级斗争。他们说：要使“富农”同我们的制度和睦相处，使他在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甚至在个人长远幸福的情况下，加入我们的制度中来^①。

铁托集团还攻击那些批评他们的人说：“难道我们必须毁灭富农来满足那已经陈腐不堪的教条的残余吗？如果我们不经过阶级斗争就成功地使富农过渡到社会主义，难道是一种错误吗？”^②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向来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农村中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不仅要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势力，而且要消灭代表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富农经济。

① 巴卡里奇 1947 年 11 月在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贝勃勒（南斯拉夫副外长）1949 年 4 月 29 日的讲话。转引自克勒曼：《从托洛茨基到铁托》，英国劳伦斯—韦斯特书店 1952 年版。



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道路，曾經写道：“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紀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于是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①

列宁在这里所说的俄国革命的道路，实际上也就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国家都必须遵循的共同道路。

铁托集团背棄这条共同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說成是“陈腐不堪的教条的残余”，在南斯拉夫坚持实行他们那种保证“富农利益不受损害”的路綫，其結果既不是什么“成功地使富农过渡到社会主义”，也不是什么富农和社会主义的“和睦相处”，而只是搞垮社会主义成分的經濟，使富农完全占領了南斯拉夫的农村陣地。

三 代表富农阶级的利益，“給农业中的經濟力量以自由的道路”

列宁曾經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綫，应当是：“穩固地依靠贫农”，“善于和中农达成協議”，“一分钟也不停止对富农的斗争”^②。

铁托集团在土地改革后的南斯拉夫农村中所实行的阶级路綫，显然不是列宁所規定的阶级路綫，而是与此完全相反的另一条阶级路綫。

他们实行这条路綫的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廢除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产品計划收购制度，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买卖制度。

一九五一年取消了馬鈴薯、肉类、油脂和干草的計划收购，一九五二年取消了粮食的計划收购，一九五三年取消了羊毛的計划收购。

铁托曾經露骨地表示过他对社会主义农产品計划收购制度的仇恨心情，他說：“我和我所有的同事們从内心深处憎恨这个制度，并且會迫不及待地期待有一天把它取消”^③。

他们实行这条路綫的另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在保证“富农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一度实行农业集体化以后，进一步适应富农經濟发展的要求，宣布放棄农业集体化道路。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南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今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的指示》，宣布放棄农民劳动合作社作为合作化的基本形式，开始解散所謂“不赢利”的合作社。这个决定，遭到了一部分坚持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干部的反抗。卡德尔說，这些干部当时“力图无论如何全盤保持劳动合作社”^④。

①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81頁。

② 参看《列宁和联合中农問題》。《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90頁。

③ 铁托1953年9月27日在魯馬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④ 見1953年3月29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铁托集团不顾这种反抗，一九五三年，又颁布了《关于农民劳动合作社的财产关系和改组的条例》。这项法令，助长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鼓励农民“自由退社”，号召他们带着自己的土地和农具退出合作社，准许合作社可以根据所谓社员的决定而整个解散。

这项法令的公布，是铁托集团彻底背叛农业集体化道路的标志。从此，农民劳动合作社便迅速解体。据南斯拉夫一九六二年《统计年鉴》等材料，一九五三年，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〇年的六千九百多个，减少到一千一百多个，一九五四年，只剩下八百九十六个，到一九六〇年，只有一百四十七个。这种合作社所拥有的农地在全国农地中所占的比重，一九五〇年有百分之十八点六，一九六〇年还不到百分之一。这些剩下来的极少数的合作社，经过“改组”，也变了质，完全失去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一九五九年，卡德尔在《农村社会主义政策问题》一书中说：“今天我们根本不再有原来词意上的，即作为集体农庄独特形式的农民劳动合作社了。”

在实行了这两个摧毁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严重步骤之后，他们在一九五四年，又颁布了《土地和房屋流通法》，正式宣布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随后，又允许土地可以自由租赁，私人可以自由雇工。

一九五八年公布的南共联盟纲领，一方面，抹煞南斯拉夫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什么“在个体生产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减少了资本主义倾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不区别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一律规定他们所谓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强制触及土地私有制”。

铁托集团在农村中摧毁社会主义阵地、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这些步骤，是他们在南斯拉夫整个经济制度中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关于这一点，早在一九五三年，卡德尔就曾经很明白地说过：“我国合作化的内部困难的根源，与其说是在于这种或那种组织上的弱点，不如说是在于合作化的社会经济实质，即在于合作化目前的各个形式——特别是劳动合作社——与今天我们的合作社所处的一般经济条件相矛盾。事情确实是这样，事实本身就作了说明，一旦我们开始了改变我们的经济制度，即取消了收购和其他行政强制性的农业计划，并出现了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自由市场的时候，在劳动合作社里就立刻出现了动摇。”他认为，南斯拉夫“其他经济都处于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条件中”，因此，“在农业政策中我们必须无保留地采取和保证不断推行的第一个原则是：使我国农业也摆脱行政领导因素，并使它的发展也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①

铁托集团为了替他们这种放弃农业集体化道路、摧毁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背叛行为做辩护，曾经作了一篇又一篇的讲演，写了一本又一本的小册子。他们企图用谎言的迷雾来蒙住人们的眼睛，但是，心劳日拙，终究藏不住自己的狐狸尾巴。

① 卡德尔：《关于我国农村政策的若干问题》。见1953年第4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杂志。



让我们从他们的讲演和小册子中，随便挑几段话来看看吧。

卡德尔说：“不应该忘记，一百五十年来我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牢固地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并教会他们只是通过经济算盘的角度来看问题，因而他们没有准备如此轻率地接受某些在经济上还未使他们信服的集体化的方案。对这种农民来讲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所以这种方法在我国就引起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劳动农民之间公开的冲突。”^①

科马尔说：集体化“在我国没有行通，因为它同我国的整个发展，特别是同财产关系、传统和物质发展水平发生了冲突，不论现在或将来，谁也不再指望这种解决问题的形式了。”^②

巴卡里奇说：“在农村中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即小商品生产者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美利坚的’道路是痛苦比较少和比较迅速的，而我们的实践也肯定了这条道路。”^③

“牢固地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说得多么好听啊！但是，只要接触一下南斯拉夫农村的历史和现实，人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在这句话后面掩盖了一系列的重要事实：被“牢固地”“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民中，存在着富农同中农、贫农、雇农之间的尖锐的阶级对立；占农村总户数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贫农和雇农，他们在战前的土地只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二十八，土地改革中虽然分得了一部分土地，其数量也不过仅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七多一点；这些贫农、雇农，由于受着地主、富农等等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他们所拥有的这点少量土地，不但在战前日益减少，而且直到现在也还在继续减少；站在另一极的富农，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过去和现在都用各种办法，兼并雇农、贫农和中农的土地。

“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集体化同南斯拉夫的“财产关系、传统和物质发展水平发生了冲突”。如果说“牢固地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说法，是一种欺瞒，那么这两句话，就是一种恐吓，一种诬蔑。谁都知道，集体化对于雇农、贫农和中农来说，不仅不是剥夺，相反地，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遵守自愿原则下，引导他们摆脱被富农剥夺的唯一道路，摆脱贫困破产的唯一道路，走上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集体化同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绝没有什么冲突。当然，集体化对于富农阶级来说，确实是一种剥夺。如果谁真想领导农民搞集体化，谁就不能不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对富农这些剥夺者实行剥夺。斯大林说得好：要实行集体化，必须在公开的战斗中击破富农阶级的反抗，“剥夺这个阶级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基础（土地的自由使用、生产工具、租用土地、劳动雇佣权等等）”。“否则就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农村集体化，更谈不到全盘集体化了。”^④ 铁托集团拿“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这种话来吓人，其实，只不过是更加清楚地暴露了他们不愿意同富农发生“冲突”的真面目，更加清楚地暴露了他们代表富农利益反对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真面目，更

① 卡德尔 1959 年 5 月 5 日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上的讲话。

② 科马尔 1957 年 4 月 26 日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上的报告。

③ 巴卡里奇 1954 年 5 月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④ 《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160 页。



加清楚地暴露了他們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面目而已。

铁托集团发誓，“不論現在或将来”，他們“誰也不再指望”集体化“这种解决問題的形式了”。他們下定决心，走“美利坚的道路”。这样一来，什么“各种經濟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呀！什么“給农业中的經濟力量以自由的道路”^①呀！諸如此类的論調的階級实质和政治含义，都暴露无遺了。铁托集团在农村中实行的階級路綫的实质，也暴露无遺了。

四 农村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几个标志

铁托集团“給农业中的經濟力量以自由的道路”，是更加促进了南斯拉夫农村中的两极分化，还是緩和了两极分化？

铁托集团的回答是：不会而且沒有促进农村的两极分化。铁托說：“我們有些共产主义者害怕，如果我們給个体农民以支持，资本主义就会立刻在农村重新滋长。这是完全多余的。有十公頃土地的最高限額^②和有各个防止剝削劳动力的法令，就不会有资本主义在农村加强的危險”^③。他們还說什么南斯拉夫“劳动农民今天更多提供的是經濟能力拉平和社会差別大大縮小的情景”^④。他們根本抹煞南斯拉夫的現实，胡謔什么：“今天不能說，我們的农村里存在着富农、中农和小农，像恩格斯过去針对十九世紀西欧资本主义条件所說的那樣。也不能說，存在被剝削的劳动群众，像列宁針对本世紀头几十年俄国情况所說的那樣。”^⑤

事实是最好的证明。

铁托集团在南斯拉夫农村推行保护老富农、培植新富农的政策的结果，大大加强了富农的障地，日益加剧了农村的两极分化。

土地占有的悬殊，是南斯拉夫农村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第一个标志。

現在的南斯拉夫农村，存在着普遍的、規模日益扩大的土地买卖和土地租賃。卡德尔在一九五九年說：“在个体所有者之間的土地流通，規模是相当大的，并表现出不断增长的趨勢”，“近年来土地的流通显著地大于战前”^⑥。科馬尔在一九六二年說：南斯拉夫农村，每年进行土地流通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⑦。铁托在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九日也承认：“我国农村的分化进行得非常快。大部分农民正在拋棄土地”^⑧。

在这种“土地流通”中，买进和租进土地的，主要是富农；卖出和租出土地的，主要是貧

① 卡德尔：《关于我国农村政策的若干問題》。

② 一九五三年，南斯拉夫法令規定，农户占有的耕地一般不得超过十公頃。

③ 铁托 1954 年 4 月 28 日在塞爾維亞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④ 弗·諾什科維奇：《論农村所有制关系的变化》。見 1958 年 2 月 7 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

⑤ 卡德尔：《农村社会主义政策問題》。貝尔格萊德文化出版社 1959 年版。“土地流通”，按照卡德尔自己的說法，包括土地买卖和土地租賃。

⑥ 見科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問題》。

⑦ 铁托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杂志主編罗伯特·謝罗德的談話。



苦农民。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三日南斯拉夫《战斗报》在以《“典型”的农村正在消失》为题的文章中说，文科夫茨县有“一万九千九百多个农户，即几乎百分之五十九点二的农户不耕种自己的土地。这主要是些小所有者，……在一九五八年他们出租了一万九千零八十公顷土地”。这就使一些富裕农户通过租进土地，“实际上把自己占有的土地增加了一倍”。有些富裕农户占有“比最高土地限额还多一倍的土地”。

南斯拉夫官方统计，在主要产粮区伏伊伏丁那自治省，买卖土地的农户，一九五九年共有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六户。在卖出的一万零五百四十公顷土地中，有百分之七十四是由拥有五公顷以下的农户卖出的。在买进的一万五千公顷土地中，有百分之五十二点五是由拥有五公顷以上的农户买进的^①。

这个自治省租进租出土地的农户，一九六〇年共有十万零二千三百户，占这个地区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二。其中拥有一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主要是出租土地，出租土地的共有二万三千四百六十三户，占这类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一点九。而拥有十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则主要是租进土地，租进土地的共有四千六百三十九户，占这类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一一点三^②。

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的过程，是大量土地在新老富农手里集中的过程，是广大贫苦农民丧失土地的过程。一九五九年，占地五公顷以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而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③。一九六〇年，在伏伊伏丁那，拥有一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平均每人有地零点一二公顷，拥有十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平均每人有地二点六一公顷，后者等于前者的二十一倍多^④。科马尔在一九六二年也承认：“关于土地租赁和土地买卖的材料无疑地说明，存在着较大的农户扩大耕地面积的趋势”。“在产粮地区，某些农户甚至占有二十公顷以上的耕地。”^⑤

富农不但通过土地的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把土地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手段，隐瞒自己的实际土地占有量。南斯拉夫《农业和合作》月刊透露：有些农户“用各种方式玩忽法律，隐瞒田产的数量。超过十公顷的新土地不登记入土地册，而继续登记在原主人的名下”。“同样，有些现象是，买来的或继承的土地不转到户主名下，而是以家庭里某一成员（儿子、媳妇、孙子等）的名义开立新户头”，但是收获的东西，却“放在一个仓库里没有分开”^⑥。

这些材料证明，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制定的关于农户占有土地不得超过十公顷的法令，

① 根据1962年第1期南斯拉夫《指数》杂志的材料计算。

② 见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

③ 见1961年第12期、1962年第1期南斯拉夫《指数》杂志。

④ 1962年第11期南斯拉夫《农业和合作》月刊。



在富农的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卡德尔在《农村社会主义政策问题》一书中承认，贫苦农民出租和出卖自己的土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足够的曳引牲畜”，“没有足够的劳动工具”，“临时需要用款”，以及“由于赋税或者其他义务”而造成的困难，由于遭受残酷剥削而丧失劳动能力。这也就是说，富农所以能够把大量土地集中到自己手中，是因为广大农民处于贫穷地位，他们逃不脱因生产资料不足、欠债等引起的丧失土地的命运。

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是南斯拉夫农村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第二个标志。

一九五七年，科马尔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上谈到农村情况的时候说，南斯拉夫的“大部分农户使用别人的生产资料来耕种自己的土地，或者把自己的土地出租。约百分之五十的农户没有畜力。私有成分中各种各样的生产关系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①

一九六〇年，在主要产粮区伏伊伏丁那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在占地两公顷以下的农户中，百分之九十三点九没有耕畜；而在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中，百分之九十五点二有耕畜，其中百分之八十三点七每户有两头以上的耕畜。拥有二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地区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但是他们拥有的耕犁只占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十户才有一张犁；畜力车辆只占百分之五点六，平均每十六户才有一辆^②。

富农不但拥有大量耕畜和普通农具，而且拥有越来越多的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农业机器。一九五六年，卡德尔承认：“农业机械仍通过各种非法渠道，首先是通过农场和合作社不断流到私人手中。例如，根据一九五五年的某些材料，仅伏伊伏丁那一地，……私人手中的拖拉机超过八百台。我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有这样的情况，两三个农民合起伙来，合买农业机器、拖拉机等，并用这些拖拉机为其他农民耕地。”^③一九五六年年初，南斯拉夫全国共有拖拉机一万二千零二十四台，其中私人占有三千二百六十二台^④。到一九六〇年，仅是伏伊伏丁那一个地区的富裕农户，就已经拥有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他农业机器^⑤。

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造成了这样的情况：缺少或者根本没有耕畜农具的贫苦农民，不得不出高额租金使用富农的耕畜和农具进行耕作，忍受富农的剥削。

雇佣关系的发展，是南斯拉夫农村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第三个标志。

由于广大贫苦农民丧失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农村中的雇佣关系大大发展起来。南斯拉

① 科马尔 1957 年 4 月 25 日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上的报告。

② 根据 1962 年第 2 期南斯拉夫《指数》杂志材料计算。

③ 卡德尔 1956 年在合作社联合会总会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④ 见《1957 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英文本）第 59 页。

⑤ 见 1962 年第 2 期南斯拉夫《指数》杂志。



夫《共产主义者》周报透露，一九五六年，塞尔维亚共和国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佣劳动。该报在引用这一材料后承认，在南斯拉夫农村，“还保留着特种‘阶级’关系”^①。南斯拉夫报刊还说，某些土地所有者“已经变成了剥削者和高利贷者。他们雇用那些没有土地或没有其它职业的人，并使这些人欠债。有些农业工人经常一再欠债，也就不断地以做工来抵偿债务”。“在杜比察地方，一个农民雇用着十个长期工人”，而且“这个例子不是个别的，据计算，约有一百九十个农民虽然拥有土地，但是自己不干农活”^②。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国拥有两公顷土地以下的农户，大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货币收入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③。

现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还有所谓劳动力包买主，他们利用失业者的困境，从事中间剥削。他们往往带领几十名、几百名失业者到农场做工，赚得大量收入。这些包工头“什么也不干，只是赌博、吃喝”^④。“这些高贵的职业介绍人，他们造了新房子，驾驶着机动车，带着一皮包、一皮包的钱”^⑤。以经营劳动力这种特种商品的买卖为职业的包买主的出现，说明了在南斯拉夫农村中，雇佣关系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列宁说过，“使用雇佣劳动是任何资本主义农业的主要特征”^⑥。他还说：“农业中雇一两个工人，哪怕只雇一个夏天也好，这已经不算少了。何况问题主要不在于多少，而在于正是最富裕、最殷实的业主才雇用工人。”^⑦现在南斯拉夫农村中的情况，不正是这样吗？

高利贷者活动的猖獗，是南斯拉夫农村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第四个标志。

恩格斯指出过：在个体经济条件下，“即使你依法保证农民有农具、牲畜等等不得转让的财物，你也仍旧无法将他们从绝境中拯救出来，因为他为了获得瞬间的展期，必须‘自愿’把自己的牲口，并且把本人也统统卖给高利贷者。”^⑧南斯拉夫的贫苦农民，正像恩格斯所描述的，随着他们的贫困破产，愈来愈多地落到了高利贷者的魔掌中。

南斯拉夫报刊透露，有的高利贷者，放出了六百万第纳尔的现款，还放出了一千五百七十公升白酒、三千六百多公斤小麦和二千二百六十公斤玉米，因而在两年内获得了五百多万第纳尔的利息。同时在他家中还有六十万第纳尔的现款、一千公升酒、约四千公斤小麦和玉米、大量的纺织品，以及全部由别人为他饲养的一百头乳牛和公牛。他家就“好像真正的信贷机关一样”，“他根据偿还的期限来确定利率，利率从百分之十到百分之百，甚至更高。落

① 1958年2月7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

② 1962年10月29日南斯拉夫《解放报》。

③ 见1962年8月20日南斯拉夫《政治报》。

④ 1963年1月9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

⑤ 1962年7月18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⑥ 《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23页。

⑦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70页。这段译文略有订正。

⑧ 《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28页。



到他的高利贷网中的有七百八十户头。这些借债者主要是他本村和邻村的人。人们都怕他，因为没有一家不欠他值钱的东西”^①。在洛兹尼查地方的一个高利贷者，他借钱给贫苦农民的条件是，在借债期间，借债者要以五尤特尔（约合二公顷半）土地上的收入作为利息^②。铁托格勒附近的一个高利贷者，当农民还不起债的时候，他就赶走农民的牛、羊、猪。这样的高利贷者，并“不是唯一的高利贷者，他的债户也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他们这种人还有的是”^③。

富农操纵农村市场，投机倒把，是南斯拉夫农村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第五个标志。

科马尔也无法掩饰这样的事实：南斯拉夫农村中“真正的农村贫民和小农，他们既无法扩大地产，也无法在农业以外谋生”。这类小农户把自己的“剩余产品”，“拿去市场出卖的情况已经绝对和相对地减少了”。“在这种市场中，较大的农户已经成为主要的角色”^④。

科马尔提供了这样的材料：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在农民为市场提供的全部产品（剩余产品）中，占有二公顷土地以下的农户（这类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和占有耕地总数的百分之十）提供全部剩余产品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占有八公顷土地以上的地产的农户（这类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和占有耕地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提供全部剩余产品的百分之三十八至四十。”^④

操纵着市场的富农，利用他们的有利地位，大肆投机倒把。科马尔说：“我们还看到无论在使用土地或劳动资料方面，都超过了平均水平的一个人数较少的阶层，他们从事加工，成批地饲养牲畜，搞贩卖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投机活动；他们获得大量收入，但这种收入唯独不是建立在扩大生产和亲自劳动的基础上的。”^④

上述土地、耕畜、农具的占有情况，劳动力买卖的情况，高利贷活动的情况，以及农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情况，这一切都证明了，铁托集团所说的，南斯拉夫农村中，不“存在着富农、中农和小农”，不“存在着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这一切都证明了，南斯拉夫农村，根本不是铁托集团所说的什么“经济能力拉平和社会差别大大缩小的情景”，根本不是铁托集团宣传的什么“中等化”，而是在剧烈地“两极化”。一极上，一个人数极少的农村资产阶级日益强大；另一极上，人数众多的雇农、贫农以及中农愈来愈贫困，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日益沦为农村中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即一小撮老富农和新富农，是南斯拉夫农村经济生活中的统治者。科马尔说：南斯拉夫农村中“一种典型的”现象，“是较大的农户在投机基础上的加强”。“这些拥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基金的农户，在某些地区担任了土地收购者和生产组织者的角

① 1958年11月15日南斯拉夫《解放报》。

② 见1962年7月19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③ 1959年6月16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④ 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



色。他們租种了絕大部分出租的土地，利用或占有超过十公頃最高限額的土地，雇用劳动力，用自己的拖拉机、脱粒机或畜力提供服务，这样就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把一部分农民束縛在自己的周圍”^①。卡德尔所說的，南斯拉夫“农村資本主义的发展已牢固地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真相，原来就是这样啊！

农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即广大的貧苦农民，則在富农的盘剝和铁托政权的直接压榨下，处境凄惨，求生无路。有些农民甚至被迫不得不卖儿卖女。南斯拉夫《青年报》报道：“男孩子在喧鬧的集市上像一头小牛，像一袋燕麦一样被出卖了。”他們在“被出卖”后就变成了“农僕”。在克罗地亚发现了七百七十八个这样的“农僕”，其中百分之七十三是在十五岁以下，而“沒有发现的农僕还要多得多”^②。

仅仅这些无可辯駁的事实，就足以揭穿铁托集团的真面目。南斯拉夫农村的整个情况比上述材料揭露的情况无疑是更加严重的。铁托集团叛变以后，南斯拉夫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蜕化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压迫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工具。铁托集团口口声声說“支持个体农民”，“代表农民的利益”，其实，他們支持和代表的只是一小撮新老富农。这一小撮富农就是铁托集团統治农村的社会基础。

五 如此“社会主义成分”

苏共领导閉眼不看南斯拉夫农村发展的“现实过程”，閉眼不看南斯拉夫农村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大量“事实”，閉口不談铁托集团在农村所推行的代表农村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路綫和基本政策，一眼盯住了“綜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社会农場”，好像淹在水中的人抓住了几根稻草一样，反复叫喊什么南斯拉夫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現在“不是百分之六，而已經是百分之十五”。

現在，我們就来透视一下，在这种“社会主义成分”里面，铁托集团玩的是**什么把戏**，有的是**什么貨色**。

铁托集团在农村推行代表农村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路綫和基本政策的結果，使南斯拉夫的广大农民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使南斯拉夫的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粮食生产长时期內不能恢复到二次大战前的水平，同战前能够出口粮食的情况相反，长期要依靠进口大宗的美国粮食来維持他們国内的粮食供应。

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南斯拉夫每年进口的小麦約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至四十，有的年份高达百分之六十、甚至百分之八十以上。进口小麦占城市小麦消費量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有的年份城市消費的小麦几乎全靠外国小麦維持。从美国进口的小麦，一般

^① 科馬尔：《农业进一步发展中的生产、經濟方面的問題和任务》。1962年7月在南共联盟四中全会上的发言。

^② 1962年3月7日南斯拉夫《青年报》。



占进口小麦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多的时候达到百分之百^①。从美国进口大宗粮食，造成了严重的支付逆差，大大加重了南斯拉夫经济上的困境。卡德尔承认：“在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比例经常失调的逆差中，我国落后的农业所不能充分供应的食品进口起着主要作用”^②。

面对着这种严重情况，铁托自己撕破了所谓“支持个体农民”的外衣。一九五五年七月，他在对美国“埃迪·薛伍德”研究班人员讲话的时候说：原来的集体化道路不行，“今天的这些小农户也不行。”“他们（小农户）无力为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居民的食用需要提供足够的小麦和其他农产品。这是很明显的，因为小农户不能很好地精耕细作，劳动生产率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出路何在呢？铁托集团认为，就是要像美国已经做过的那样，走大农场主吞并小农庄的道路。在同一次讲话中，铁托公开说：“我们并不放弃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将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并在这方面找到一个‘和平相处的协议’的想法。在美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铁托集团走美国农业道路的办法就是，在极力扶持富农经济的同时，扩大他们的“社会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说，“所谓‘农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农场。所谓‘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实质上是一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的上述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因为：

第一，从扩大耕地面积的手段来看，“社会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采取的是兼并农民土地的办法。

铁托集团以“扩大和加强农业中的社会主义关系”为名，通过官方的农业银行，向这些“社会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提供大量的购买土地的贷款，以支持它们兼并贫苦农民的土地。一九五九年，通过的《农地使用法》规定，“社会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有权优先购买和租赁农民的土地，并且有权对那些无力按照官方规定的技术经济标准进行经营的贫苦农民的土地，实行“强制管理”。

卡德尔说：“全部实践表明，只要土地的价格使得购买在经济上是合算的，农场和合作社就可以而且应当比过去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购买尽可能多的流通中的土地的中心。”^③

一九六二年，科马尔在《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的文章中进一步强调：“需要采取坚决得多的措施”，来兼并那些贫苦的和无力提供商品农产品的农户的土地。他强调，这些农户，必须“迅速地把自己的部分土地或全部土地出卖或长期出租给农业组织”。他又在一九六二年南共联盟四中全会上说：“必须保证农业组织和其他组织所必需的有刺激性的贷款条件和其他条

① 根据 1955 年、1958 年、1960 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1963 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统计年鉴》，《1964 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科马尔 1962 年 7 月在南共联盟四中全会上讲话等材料。

② 卡德尔：《农村社会主义政策问题》。



件，以便它们能够购买、租赁和合并这种土地，并通过长期合作等等来获得这种土地”。

在这种政策支持下，“社会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兼并农民土地的规模迅速扩大。据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九日南斯拉夫《经济政策》报道，一九六〇年“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的土地由四年以前的二十万零二千公顷增至六十五万七千公顷，而“社会农场”则由六十三万六千公顷增至八十万公顷。又据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经济政策》透露，“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购买的土地，一九五九年为一万八千公顷，一九六〇年为二万八千公顷；租赁的土地一九五九年为五万公顷，一九六〇年为十一万六千公顷。“社会农场”一九五九年购买土地七千公顷，租赁土地二万一千公顷。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南斯拉夫《政治报》还报道，马其顿共和国的“社会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的土地，近两年来由一万八千公顷增至六万公顷，其中“大量耕地是近几年从个体生产者那里买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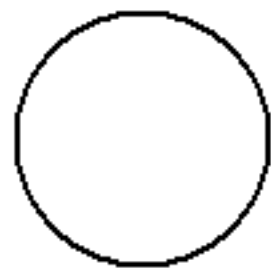
第二，从同农业工人的关系来看，“社会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对农业工人进行着残酷的剥削。

在“社会农场”里，经理把持一切，农业工人毫无权利，他们的工资很低，劳动时间很长，生活条件很坏。

南斯拉夫报纸说，有些农场经理任命劳动力包买主当工头、队长和组长。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南斯拉夫《青年报》说，“仅在阿帕廷农场，就大约有三十个组长。他们……基本上一点也不劳动，但是他们除了在算账时进行剋扣外，全都得到经常的佣金”。“他们在农村里招募工人，并在这种妙不可言的生意中赚到房屋和小汽车，成为‘出名的人’”。这家报纸对这个农场里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工资情况还作了这样的介绍：“最通常是‘从黎明劳动到天黑’，这意味着每天十六小时”。“经理的算法是这样：八、九个工人用八小时的劳动可以收割一公顷的玉米，而企业每公顷付出一万七千第纳尔。由此看来，每个工人每天应挣二千第纳尔。但是并非如此，虽然他们不得不‘从天蒙蒙亮劳动到天漆黑’，这个农场中某些组里的工人在十五天内只领到三千第纳尔，最多是三千五百第纳尔。组长每天剋扣每个工人多少——是可以容易地算出的。”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南斯拉夫《战斗报》报道，一个包工头去年率领了九十名工人在一个农场工作，“几天内就‘赚了’一百一十八万六千第纳尔”，今年他率领着一百人。“同时在一个农场中，还有一个带着一百五十名工人的工头，拿到了一百万以上的第纳尔”。

这些劳动力包买主常常勾结农场经理，共同榨取农业工人。据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报道，在摩斯塔尔，“几乎在所有的区里都已发现工头把葡萄酒、白酒、葡萄、烟草等作为礼品赠送给农场的领导人”。这些工头一下子“赚了几百万”，而“工人的住宿、伙食、工资……都非常坏”。“男工和女工一起按组睡在不像样的木棚和畜栏里”。

“社会农场”对农业工人的这种剥削，已经达到使农业工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有的农场工人举行了罢工。据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四日南斯拉夫《劳动报》透露，“斯累姆战士”农场的一批



工人曾經在九月三十日舉行罷工。他們責問說：“我們靠什麼過活？靠空氣嗎？”這家報紙說，這個農場的“三百名工人已整整三個月沒有領到個人收入”。“農場的大多數工人都沒有自己的土地，也沒有其他任何收入”。

“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也大量雇用長期的和臨時的農業工人，進行剝削。據官方統計，一九六一年，各種“合作社”雇用的固定農業工人，有十萬多名^①。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南斯拉夫《勞動報》透露，被雇用的農業工人“經常受到最粗暴的剝削（勞動日長達十五小時），他們的個人收入通常是十分低微的”。“居住條件和伙食也非常壞”，常常是一百人或二百人居住在一個木棚里。“這些工人幾乎沒有任何權利，而農業組織要他們履行的義務却是非常多的”。

第三，從經營方針來看，“社會農場”和“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執行的是資本主義的“最高贏利原則”。

南斯拉夫的“社會農場”同南斯拉夫城市中的“社會所有”企業一樣，也實行“工人自治”，以追求高額利潤為經營目的。

“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憑藉着鐵托政權給予的向農民收購農產品的壟斷權，在商業活動中，利用農產品價格自由漲落的條件，賤買貴賣，大做投機生意，謀取高額利潤，剝削農民。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農業減產，“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和其他商業機構就趁機哄抬農產品的銷售價格。一九五九年的農業收成有所增加，“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就破壞同農民簽訂的收購合同，減少收購數量，不惜讓農產品爛在地里。在許多地區，“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銷售農產品的價格比收購農產品的價格甚至高出百分之二百到三百。

這種“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實際上是一種以追求最高贏利為原則的、主要從事商業活動的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它的業務範圍包括：供銷工業品、收購農產品、農產品加工、手工業、其他加工工業、為個體農民提供機耕等所謂“服務”。據統計，一九五七年上述各項業務收入所占比重是：供銷工業品占百分之十五點四，收購農產品占百分之二十八點一，農產品加工占百分之九點三，旅館飲食、手工業、公用事業及其他業務活動共占百分之十八點七，農業生產僅占百分之二十八點五^②。這種“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土地很少，據南斯拉夫聯邦執行委員會一九六一年工作報告提供的材料，一九六〇年在四千零六十七個“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中，有百分之十九根本沒有土地，有百分之三十四只有五公頃以下的土地。對於這種情況，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南斯拉夫《經濟評論》寫道：“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不斷地並且越來越多地恢復商業活動，而忽視農業和其他活動。歸根到底，這種合作社正在失去農業勞動者合作社的性質。”

為了謀取高額利潤，一方面，像一般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和資本家之間進行着劇烈

① 見《1962年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統計年鑑》。

② 韋利米爾·瓦西奇：《南斯拉夫農業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貝爾格萊德勞動出版社1960年版，第107—108頁。



的競爭一样，“綜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其他农业組織同富农之間也进行着剧烈的競爭。但是，另一方面，它們又把富农和一些富裕农民看作为最有利的合作者加以支持。科馬尔这样說：“需要強調指出，必須使合作社和其他組織的活动也将刺激和发展比較发达的农户对增加生产和同农业組織进行合作的經濟上的兴趣，以便它們在这种合作中获得更多的收入。不應該忽視拥有五公頃以上土地的农户提供农民剩余产品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因此，他們是一部分最重要的个体生产者。目前他們自己的独戶經營的趋势，應該被引导到更密切地同农业組織进行生产合作的方向去。”^①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南斯拉夫《战斗报》提供了以下材料：在奥西耶克县(南斯拉夫的粮产区)，“将近有百分之五十的农户占有三公頃以下的土地。明摆着的问题是：同非商品生产者发生合作的关系，合作社有什么好处呢？是否要在他們不可能正常維持生活的土地上免費保证他們的生存呢？这样对誰有利？”“核算表明，同比較稳定的农民进行合作是比較赢利和比較合算的，他們能够用土地为市場生产，并且对于他們來說，土地是基本的和唯一的收入来源。进行这种合作，合作社和生产者在經濟上都同样合算。”要同那些“比較发达的农户”合作，不要同那些“非商品生产者”合作，取决于什么样的标准呢？无非是能否“获得更多的收入”而已。

这就是說，这种“綜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不但不触动土地私有制，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扶植富农經濟的发展。这些“合作社”，甚至直接操纵在富农分子手中。

《南斯拉夫农业問題》一书中說：从某些合作社“今天的情况和它們所起的作用来看，它們絲毫不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說它們的作用是在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据点，只能說它們在发展和帮助資本主义因素。有这种情况，这些合作社是富农分子的联合”。

这个自我揭露的材料，把他們的底揭得太清楚了。他們狼狽不堪，无法辯駁，只好耍賴。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七日，南共联盟机关刊物《共产主义者》周报发表了該报社长、南共联盟中央委員、南共联盟中央組織政治書記处書記奥索尔尼克的题为《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政策》的文章，特意挑出这个材料說：《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嗎？》的“文章中提到有一部貝尔格莱德出版的，据說题为《南斯拉夫农业問題》的书。中国作者不指出作者，不指出引語的出处，决不是偶然的，因为这完全是臆造出来的”。

他們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蒙混过去。

为了帮助讀者看清他們的无賴嘴臉，我們給讀者們提供这样一个有趣的材料吧：《南斯拉夫农业問題》一书，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由“教育”印刷企业印刷，貝尔格莱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教育”印刷企业設在貝尔格莱德朱雷·賈科維奇街二十一号。这本书的扉頁里注明，編輯委員共五人：布兰科·米約維奇、柳比沙夫·馬尔科維奇、米洛万·迪尼奇、斯維塔·波波維奇、斯洛波丹·格利哥里耶維奇。这本书包括四篇文章：米倫納·米奧德腊哥維奇的

^① 科馬尔：《农业进一步发展中的生产、經濟方面的問題和任务》。



《农业生产的特点和特殊性》，希耳米亚·哈萨纳吉奇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米路廷·伊万诺维奇的《南斯拉夫农业生产的状况和问题》，德腊哥斯拉夫·穆塔波维奇的《论合作化》。《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引用的和我们这篇文章从新引用的一段话，就是出自德腊哥斯拉夫·穆塔波维奇的《论合作化》一文，见该书第一百一十三页。

总之，以上三个方面的材料，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南斯拉夫的“社会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的资本主义性质。这种农业组织的扩大和发展，是建立在剥夺小农的基础上；这种农业组织同农业工人的关系，是剥削者同被剥削者的关系，是资本家同雇佣劳动者的关系；这种农业组织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的全部活动，都遵循着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这种农业组织是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剥削农民的工具。

这就是说，南斯拉夫的“社会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富农经济一样，是靠剥夺和剥削小农起家的。和富农经济不同的只是：第一，它披着“社会主义成分”的伪装；第二，它更加受到铁托政权的直接控制和直接支持。

六 结论是南斯拉夫农村的资本主义愈来愈泛滥

从以上的材料和分析，能够得出的结论，绝不是南斯拉夫农村的什么“社会主义阵地正在加强”，而只是南斯拉夫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愈来愈泛滥。

在铁托集团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下，现在在南斯拉夫农村占统治地位的有两大势力，一个是一直保存下来并且日益得到发展的富农经济，另一个是由铁托政权直接控制和支持的“社会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加强这两种资本主义势力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就是铁托集团“加强农业”的现行基本政策的两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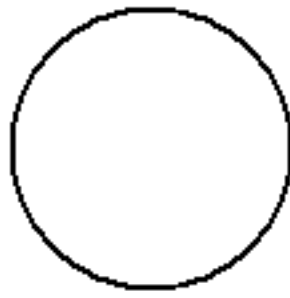
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对铁托集团的这种政策，表示赞赏地说：“‘加强农业’政策同西方民主国家的标准的历史经验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它以自由市场中的竞争来迫使个体农民进行现代化改造，要不，就得放弃经营。”^①

铁托集团自己不願意说得这样清楚，他们含糊其词地说，在南斯拉夫农村实行的是，“给农业中的经济力量以自由的道路”。

赫鲁晓夫十分羡慕铁托的所谓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经验。他跟在铁托后边，要走美国农场主的道路。这大概就是这种“自由的道路”吧！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反复揭露过的资产阶级自由一样，铁托集团宣扬的这种“自由”，也是资产阶级剥削的自由，压迫的自由，发财的自由，掠夺的自由；是劳动者受剥削的自由，受压迫的自由，丧失土地的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挨饿受冻的自由，在死亡线上进行挣扎的自由。

^① 查尔斯·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纽约圣马丁印书馆、伦敦麦克米伦公司 1957 年版。



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必定胜利

林文山 郑公盾

奴隶贸易是资本的原始 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

远古以来，黑人在非洲的土地上生长着和生活着。黑人是非洲大陆的真正主人。他们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过显著的作用，对科学文化有过卓越的贡献。如果没有外来的侵入，他们将一步步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建设更加文明的新非洲。但是，自从十五世纪殖民主义者侵入非洲之后，非洲人民开始了长达四百年的被贩卖、被奴役、被剥削的悲惨生活。

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上半叶，正是资本主义开始发生和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通过暴力手段实现原始积累。为此，资产阶级除了大力地用暴力在本地开拓地盘之外，还以更加残暴的方式对外掠夺。惨无人道的非洲奴隶买卖的利润，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资本家的巨大财产是建筑在黑人奴隶的血和骨上面的。工业革命的资金大部分来自这宗买卖。

那时，海盗船只打着“耶稣号”之类的招牌，从欧洲载运廉价的工业品到非洲，用欺骗和掠夺的手法向非洲的首长们换取黑人奴隶，然后把黑人奴隶运到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各地，高价地卖给那些种植园主和矿山资本家，换取那里廉价的原料运回欧洲。然后，再把用这些原料制成的工业品，运到非洲去换取黑人奴隶。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所谓“三角贸易”。

殖民主义者在这个“三角贸易”中，特别是在买卖和贩运黑人奴隶这一交易中所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从十五世纪中叶起，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美国，都干过奴隶贸易的勾当，并且不惜用战争来互相争夺贩运奴隶的控制权。在十八世纪初，英国是主要的从非洲贩运黑人奴隶的国家。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指出，到了十九世纪，奴隶买卖“最后主要是靠美国资本、由美国船只装运，在美国公民管理下、在美国旗帜下维持下去的”。

殖民主义者常常勾结黑人酋长和头目出卖本部落的黑人，而那价格，像梅里美的小说《塔曼果》所描写的，“一些粗劣的棉布，和一些火药，打火石，三桶烧酒，五十支造得很坏的步枪”，就交换了一百六十名奴隶；然后，三杯烧酒又换去了三个小孩，一只厚纸做的鼻烟盒换去了六个剩下的奴隶。

殖民主义者鼓动沿海地区的黑人酋长去抢劫邻近地区的黑人，甚至自己也组织了所谓“猎捕队”，偷袭黑人的村落，往往一夜之间，就把那些和平安静的黑人村落糟踏成荒无人烟的废墟。

就这样，最少有一亿到一亿五千万以上的黑人从非洲被劫走或在劫掠中被杀害。被劫走的黑人，都是最强壮的劳动力。奴隶贸易严重地破坏了非洲的生产力，阻碍了非洲社会文化的发展。不仅如此，殖民主义者还进一步地掠夺非洲的矿产、农业资源和土地，瓜分非洲，使非洲变成被他们长期剥削和奴役的殖民地。

那些用种种手法夺取来的黑人奴隶，被一批一批地从他们的故乡——非洲贩运出去。他们给加上了手铐脚镣，像“毳子般叠在一起”，被搁置在船仓里。贩奴者甚至要把他们的脚架起来，使他们动弹



不得。有些船的上下仓板間隔只有十八英寸高。美国贩奴船“龐加斯号”曾經把二百五十个女奴隶（包括許多孕妇）装在一間十六英尺长、十八英尺寬的船仓里。她們的“膝头都互相交插在一起，連向左右移动一英寸的余地都沒有”。一个贩奴船的船长說，黑人奴隶“在船上所占的面积，还不如一个人睡在棺材里的地方大”。仓里的悶热和臭气使人昏厥和窒息。許多黑人在航行的中途就被折磨死了。折磨死的和患上傳染病的黑人，被扔到大海里去喂鲨鱼。饥饿的鲨鱼为这种“美味的食物”所吸引，不断地追逐着贩奴船只。为了鎮压黑人的反抗，他們对黑人施加种种酷刑，輕則鞭打，重則砍手断头，或者扔到海里去。

进行奴隶貿易，給西欧和北美洲的资产階級带来大笔的利潤。在通常的情况下，販运黑人奴隶可以获得百分之一百、甚至百分之一千的厚利。当时奴隶販子曾經做过这样的計算，他們只要在三船奴隶中有一船逃避开海盗和其他方面的劫掠，安然到达目的地，就可以发一笔横財。就这样，英国利物浦的一个販卖奴隶的商人，仅在短短的十年內，由于販运三十万零三千奴隶，就获得了二百三十六万英鎊的利潤。美国巴尔的摩的贩奴船“爱神号”，建造費为三万美元，第一次贩奴航行就賺得利潤二十万美元。用这种极殘暴的手段劫取到的財宝，流回母国，在那里轉化为資本，造起了工厂，使包括英国在內的欧洲国家和北美洲大大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

在奴隶貿易中，美国殖民者起着特別卑劣、特別无耻的作用。在十九世紀，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使用更“文明”的方式剝削非洲人民，把非洲变成他們的殖民地，宣布了禁止奴隶貿易。之后，美国政府虽然也宣布禁止奴隶买卖，实际上却从来也沒有这样做。美国人这时控制了整個西半球的奴隶买卖。他們从中获得特別丰厚的利潤。奴隶販子为了逃避檢查，常常在危急关头把整船的奴隶丢到海里去。在这段期間，从非洲运出的黑人据說比过去多了三倍，其中三分之二是在公海上被杀害的。

建筑在黑人奴隶的骨和血 上的资本主义

奴隶貿易是資本的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奴隶劳动又是资本主义成长和发展的基础。这一点，在北美洲表現得特別突出。比起奴隶买卖，奴隶制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更大的作用。

北美洲殖民地生产的发展，首先是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同黑人奴隶的大量輸入分不开的。北美洲的资源是十分丰富的。但是，只要一切价值的創造者——劳动力尚未具备，这些资源便依然沒法发掘出来，变成物质財富。劫掠来的黑人为美国資本家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在北美洲南部，几乎一切主要工作都由黑人奴隶担任。在烟草的主要产地之一弗吉尼亚，一六五〇年只有黑人奴隶三百名（其中包括部分“自由”黑人）。为了发展烟草生产，种植园主在一六六〇年以后大量輸入黑人奴隶。一六七一年，弗吉尼亚的黑人奴隶就增加到二千人；一七一五年增加到二万三千人，占当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一七六〇年更增加到二十万人，占当地总人口的一半。而弗吉尼亚的烟草生产，又正是在一六六〇年以后才得以大发展的。一七九三年，軋棉机发明以后，棉花代替了烟草成为美国南部种植园农作物的中心。种植棉花需要更多的黑人奴隶。美国南部黑人奴隶人数也就因而从一七九〇年的六十七万多人增加到一八六〇年的将近四百万人。这些数字，清楚地說明了为什么奴隶买卖在十六世紀随着美洲的发现和开发而特別猖獗起来。

从非洲販运来的黑人奴隶，被迫用自己的血汗和眼泪把荒涼的北美洲开发了起来。在非洲被劫掠、在航船上被折磨的黑人奴隶，在这里并没有終止而仅仅是开始了他們苦难的历程。一部美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黑人奴隶遭受奴役和摧殘的历史。

北美洲种植园的奴隶制，混合着古代、中世紀和現代各种剝削制度中最野蛮、最无耻的成分。它



不同于古代那种自给自足、主要为奴隶主的享受而生产的奴隶制，它一开始就是为了向世界市场出售商品、谋取利润而生产的。但是，它又保有奴隶制中那种对奴隶肉体上的奴役。作为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家三位一体的种植园主，拼命地从黑人奴隶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利润。奴隶们被强迫每天工作十八小时甚至更长一些，直到他们精疲力竭地倒下去为止。

此外，种植园主还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拼命加强黑人奴隶们的劳动强度。奴隶们经常处在工头和监工的监视之下工作，稍不小心就要挨鞭子。

奴隶们从事着过度的劳动，可是生活条件却非常糟。一个种植园主供认，每名奴隶一年的伙食费用是七元五角美元，这个数字还包括医药费和监工的伙食费；衣服、鞋子、被盖、采集棉花用的口袋等等物品，合计起来也是每名奴隶七元五角一年。这还是正常时期的开支。当经济萧条和危机临到这时，奴隶们的生活条件就更坏了，简直不如监狱里的犯人。

奴隶主将美国南部变成把人当作牲口饲养的牛栏。在这个“饲养场”里，为了找到更多的劳动力，奴隶主们力求黑人奴隶生儿育女，甚至规定了奖励办法，要不满十六岁的黑人女孩子生育，把十七岁的生子女多的女黑奴加以奖赏。他们甚至把身强力壮的黑人奴隶作为“传种黑人”，像牲畜一样从这一个庄园送到那一个庄园去“配种”。这些“传种黑人”可以受到最好的“饲养”。

黑人奴隶是人而不是牲口，他们会要求改善自己的处境，会反抗，因此，奴隶主们对待黑人奴隶甚至比对那些不会思想、不懂得反抗的牲口更加残酷。对奴隶施行肉体虐待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一个名叫阿莫斯·斯托达德的美军少校在目击了这些虐待后写道：“残酷的、乃至于异想天开的惩罚，每天落在这些因饱受饥饿、劳累和鞭子摧残而体力羸弱的苦命人身上。……由道德败坏的奴隶主和总管——这些人大多数都表现为一种愚昧和邪恶

的奇异的混合物——所造成的创伤，折磨着过路人的情感，使他的心绞痛流血。”

沉重的压榨，使一个奴隶劳动力往往只能维持六、七年。一旦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就会像一只挤干了的檸檬一样被抛弃，任由饥饿和死亡来迎接他们。

在美国摆脱英国殖民地羁绊的独立运动中，虽然宣布了人人“生而不等”的独立宣言，但这对于被认为不是人的黑人来说，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奴隶买卖在美国各地照样盛行着，纽约就是贩奴的中心。奴隶仍然是奴隶主的“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仍然拥有从鞭打到扼杀奴隶的一切权利。这一切权利，甚至还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

在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六五年的南北战争中，北方新兴资产阶级战胜后，美国黑人名义上是“解放”了，但是，黑人实际上仍然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只不过这种奴隶制度略略改变了一下形式罢了。就像列宁所说的，奴隶制度的经济残余同封建制度的经济残余“至今还很大”，“闭塞不通，粗野无知，缺乏新鲜空气，好像一座对付‘解放了的’黑人的监狱，这就是美国的南部”^①。

资本，确实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黑人在美国历史中的卓越贡献

是黑人的劳动，把美洲荒原开发起来。他们给种植园主种植烟草、靛青、水稻和棉花。黑人的劳动使得南部几个州输出的烟草到十八世纪初就达到二千八百万磅，到独立战争前夕又猛增至一亿零二百万磅。黑人的劳动，使美国棉花生产从一七九〇年的年产三百万磅增加到一八六〇年的年产三十八亿磅。黑人奴隶用自己的血汗生产出来的这些财富，喂肥了南部的奴隶主，成为北美洲殖民地取得经济独立的基础。

^① 《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1、13页。



棉花生产的发展，还同时促进了纺织工业、航运工业等工业部门的发展，使纺织工厂由一八〇三年的四家增加到一八四〇年的一千二百四十家，纺织工业的棉花消费量从一八一五年的五万四千包增加到一八六〇年的八十四万五千包，使纺织工业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工业部门。事情确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洲。”^①南北战争以后，许多黑人从南方的农业区跑到北方的工业区，参加工业生产，担负了许多繁重艰巨的劳动，这也是美国工业生产得以从那个时期起迅速发展的一个因素。

在美国独立的革命中，第一个为美国独立牺牲的烈士是黑人克利斯普斯·阿塔克斯。五千以上的黑人在星条旗下英勇地参加了战斗。他们在革命面临着失败的危险时，起了扭转局势的决定作用。就如目击长岛战役的哈里斯博士所说的：“如果他们（黑人）不忠诚的话，那末一切早就完了。”在他们当中，有着萨勒姆·普尔、詹姆斯·亚米斯特德、奥斯汀·达布内、普林斯……这样一批英勇机智的英雄人物，有着德波拉·甘内特这样一些花木兰式的女战斗英雄。

在南北战争中，黑人为了联邦的统一又作了英勇的斗争。黑人奴隶在种植园举行了多次起义，约有五十万人逃离种植园，成批地逃往联邦的防线，从而扰乱了南部同盟各州的后方。大约有二十万黑人参加了联邦陆军，三万黑人参加了联邦海军，二十五万黑人参加挖战壕和造堡垒。将近七万黑人士兵为此付出了生命，而没有一个黑人为保卫南部同盟放过一枪。最先攻进南部同盟首府里士满的是黑人联队，最先把美国国旗升起在南部同盟议会大厦上的，也是一名黑人。黑人战士是这场伟大内战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黑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争取到受教育的机会，黑人在多么不平等的条件下取得工作的权利，黑人的创造力受到多么不合理的压抑和打击，

他们在科学文化的领域中仍然作出杰出的贡献，有过许多著名的人才。

黑人在科学技术领域中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在近一百年来，他们的专利发明就有五千件，其中有些是非常重要的发明。在美国历史中，有着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发明家本杰明·班尼克尔，润滑技术专家伊利加·麦克埃，炼糖用的真空锅的发明者罗伯特·里厄，多种电器的发明者格兰威尔·伍兹，制鞋机的创造者杰安·麦兹利格，名著《细胞表皮的生物学》的作者、生物学家爱尔奈斯特·哲斯特，对于甘薯、花生和其他农产品的研究有着显著的成就，给南部增加了许多财富的天才学者乔治·华盛顿·卡维。而且，在这当中，又有着多少黑人的发明家，被奴隶主、资本家吞没了他们创造的果实！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那位发明漚麻机的哲而治的遭遇，就是这种情形在文艺作品中的反映。

在美国黑人中，有着威廉斯、杜波依斯、伍德逊等许多历史家。他们特别着重编写黑人的历史和成就，为增强黑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著作被译成了许多国家的文字。

在美国的黑人文学中，有着菲利斯·惠特莱这样出身于奴隶的才华优美的诗人，以及保尔·劳伦斯·顿巴、康第·康伦、朗斯敦·休士、杜波依斯等许多著名的黑人作家。他们的作品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个很有价值的部分。

黑人的音乐、舞蹈和戏剧，被确切地称为“唯一来自美国本土和美国生活的艺术品”。在这些领域中的黑人艺术家有卓越无比的歌唱家玛丽安·安德逊，伟大的歌唱家、演说家和演员保尔·罗伯逊和舞蹈家约瑟芬·贝克。他们的艺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钦佩。

美国黑人更在体育运动方面以他们的辉煌成就为美国增添声誉。长期以来，美国的世界冠军有很

^①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45、146页。



多都是黑人运动员争得的。在一九六〇年的第十七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黑人在男子田径赛中取得了六枚金质奖章，对美国的获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至于国际奥运会主席、美国人布伦戴奇也不得不承认，要是没有黑人运动员，“我们就会降为第二流水平了”。

美国黑人为美国增添了这样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给资本家带来了这样丰厚的收益；没有黑人，就没有今天美国人在那里大肆吹嘘的“先进的农业”；没有黑人参加的英勇战斗取得的对外独立和对内统一，就没有美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是，这一切带给黑人的是什么呢？

歧视，歧视，奴隶和歧视！

黑人在美国的地位和得到的待遇，却正好同他们的贡献成反比例。

“最后受雇，最先解雇”的原则，大量黑人的失业，迫使黑人在为了免于饥饿的情况下接受任何工作。黑人的工资从来都是十分低微的。据美国黑人组织城市联盟统计，目前美国全国黑人的平均全年工资只相当于白人平均全年工资的百分之五十四，而一九五二年为百分之五十七。美国官方承认，在种族歧视特别猖獗的南方，一九六〇年黑人男子的工资收入只相当于白人男子工资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三。

黑人工人的工资低，有人认为是由于黑人受教育的机会少，得到熟练工作的机会少。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事实证明，受过同等教育的黑人工人，他们的平均工资仍然远低于白人工人。相反，所受的教育低于黑人工人的白人工人，他们的工资却仍然比黑人工人高。而且，资本家们还往往把那些黑人做的最紧张、最危险、最不愉快、最不卫生的工作说成是“非技术”性工作，使黑人的低工资“合理化”“合法化”。

黑人对美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贡献最大，但是黑人在农业方面所受的压榨又是特别残酷。从事农业

劳动的黑人绝大部分是分成制佃农和雇工。农业雇工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工资劳动者。住在耕地里的雇工，所得到的工资只是一所可容他一家人居住的小屋以及在种植园的供应店里除买口粮的权利，很少能得到现金。分成制佃农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奴隶制度，分成制佃农的一切活动都得听种植园主的指挥，并由带着枪的走狗严密监督。他们全家大小成年累月辛勤劳动，但是，成果的一半以上要交给种植园主。此外，他们还受着种植园主的高利贷的残酷盘剥。至于那些小农、现金佃农，他们的遭遇比之雇工，分成制佃农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只能勉强维持一种不稳定的生活。在危机和不景气的年头，他们就得被驱逐到雇工、分成制佃农的行列里。

就这样，通过种种的剥削和掠夺，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从黑色劳动者的身上，多榨取了巨额的超额利润。

在这个自称为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里，虽然宪法上没有缺少承认黑人享有白人享有的权利的条文，但是，黑人事实上被剥夺了种种政治权利：

黑人的选举权受到种种苛刻的限制；

黑人像传染病患者一样被迫住在特定的街区和移民居住地；

那些专供白人使用的饭店、电影院、剧院、图书馆、医院、旅馆等，禁止一切黑人入内。甚至在电车、公共汽车上，也给黑人划定了位置；

黑人事实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黑人一直没有取得平等的劳动权利。

总之，在美国，就如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所说的，“美国黑人是美国工人阶级中最受剥削和压迫的。他们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这个所谓领导国家境内的被剥夺权利的殖民地人民”。黑人尽管没有了奴隶的称号，但是仍然没有取得人的身份。美国一个叫做哈利逊的牧师就曾经向一群三K党暴徒们说过这样的话：“在上帝眼中杀害黑人并不是罪恶，因为黑人无异就是狗。”因此，对黑人运用各种私刑，是美国统治阶级对黑人种族歧视中最残暴最



野蛮的手段之一。戴着面罩的三K党，是个专门杀害黑人的秘密团体，他们今天走到这里，明天走到那里，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成千上万的黑人。

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荒唐、更不合理的吗？

种族歧视不仅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黑色劳动者的工具，同时也是他们更便于统治和剥削白色劳动者的工具。

美国统治集团为了延长它的反动统治，竭力挑拨白人劳动者对黑人的仇视，造成白人劳动者对黑人劳动者的偏见，以破坏劳动人民的团结，转移劳动人民的斗争目标。

在经济上把黑人压在下面，也势必使美国南部忍受全国最低的工资水平。例如，素来排斥黑人的纺织工业的工资，越深入南部就越低。那道理是很明显的。一个便宜的、没有正当权利的劳动力特别后备军，自然是非常理想的压低白人人工工资的手段。包括白人在内的南方人，是美国吃得最糟、住得最坏、穿得最破、收入最少的人民。就是美国北部和西部，雇主们也在用把工厂搬到南方去等手段来破坏工人的罢工，压低工人的工资。

所谓“白人优越”，就是用包括白人工人在内的美国劳动人民的更低的生活水平为代价换取来的。

民族压迫，说到底不过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另一种形式。

总之，美国社会中对黑人种种野蛮无耻的歧视和迫害，归根结蒂，完全是为了适应垄断资本家、大种植园主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需要，是美国人吃人的社会制度的产物。

“宁肯死为自由人，也不 愿活着当奴隶”

世界上存在着掠夺、奴役的现象，也就必然会引起反掠夺、反奴役的斗争；存在着野蛮的种族歧视，也就必然会引起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被掠夺、被剥削、被歧视的黑人的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他们的斗争是一首壮丽的史诗。

长时期的斗争，使黑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高了自己的觉悟。

一个世纪以来，美国黑人为了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和自由权利，曾经作过各种尝试和探索。他们有的人主张黑人通过掌握技术，培养忍耐性，获得财产，挤进上层社会，从而使黑人获得自由；有的人提出“回非洲去”的方案，主张“在祖先的土地上建立一个黑人国家”。残酷的现实教育了黑人，把希望寄托在挤进上层社会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有害的幻想。在美国进入帝国主义以及种族歧视日益加剧的条件下，黑人要挤进上层社会去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主张实际上等于向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奉献一批受过训练、唯命是从的黑人劳动力，供他们进行最大限度的剥削。“回非洲去”的方案也只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的计划，它不是解决美国黑人问题的根本办法，反而会削弱、损害黑人在美国本土争取平等和自由权利的斗争。

黑人在他们的斗争中也曾经采用过沉默抗议、静坐示威、上法庭同统治阶级“说理”等手段。这些斗争，在某一时期内、某个具体问题上，也曾经取得过一些表面的胜利。为了自己利益的需要，为了平息黑人的怒火，美国资产阶级常常对黑人许下“解放”“自由”的诺言。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几乎所有的州的统治者都答应在美国独立时给服役的黑奴以自由；在南北战争中，林肯宣布了废除奴隶制。在一八六六年、一八七〇年、一八七一年、一八七五年、一九五七年、一九六〇年，美国政府都通过了对保障黑人公民权利作出明文规定的所谓“民权法案”。但是，事实已经证明，这些“诺言”、“法案”都只不过是一场骗局。一九六三年肯尼迪政府所提出、由约翰逊政府接过来加紧推销的“民权法案”，也不过是依样画葫芦地再玩弄一次早已被拆穿了的把戏而已。美国所有的统治机构，都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工具，不能把希望寄托于他们恩赐的“诺言”和“法案”。

残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黑人，他们开始懂得：民族压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资产阶级绝不可能取消民族压迫，就如他们绝不可能取消阶级



剝削一样。他們开始看穿統治階級所玩弄的伎倆，認識到，單純依靠法庭和議會的斗争，不能使黑人摆脱被歧視被奴役的悲惨地位。他們已經开始抛开幻想，團結起来，从法庭走向街头，进行坚决斗争。在斗争中，他們针对着統治階級經常玩弄的騙术，提出了鮮明的战斗口号：要求全面的自由，要求在社会、政治、經濟等一切方面廢除种族歧視制度，全面实现黑人的平等权利，而不只是仅仅某一项具体措施；要求立刻自由，“我們現在就要自由！”而不是遙遙无期的所謂“长时期逐步解决”。这些鮮明的战斗口号，是黑人斗争进入到新的阶段，黑人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日益起作用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又会反过来促使更多的黑人参加斗争，把斗争推向一个更加高漲的阶段。

一九六三年首先从伯明翰市掀起的黑人爭取平等权利、反对种族歧視的斗争，正是这一新阶段的最显明的标志。

这一阶段斗争的明显特点之一是，越来越多的黑人参加到斗争的行列。南北战争以后，黑人有組織的斗争是从十九世紀末出現的。从十九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中，黑人运动主要仍局限于一部分受过教育的黑人中产階級。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这一时期中，黑人无产阶级也比較多地参加到斗争的行列中来，因而扩大了运动的規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黑人无产階級的力量更加壮大了，全世界範圍內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也进一步高漲了，美国国内的階級斗争进一步尖銳化了，这就使得黑人的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群众性斗争空前高漲的阶段。从一九五七年反对教育隔离的小石城事件开始，群众性的大規模的斗争更是日益高漲。一九六〇年为了反对服务性行业中种族隔离而举行的“入座”示威，就曾席卷南部各州，有二十多万人参加。而一九六三年的斗争，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长和斗争的尖銳程度，在美国黑人斗争史上是少見的。斗争此伏彼起，声势浩大，波瀾壯闊，从几十人发展到几十万人，从一个市、一个州而发展到十几个州，最后几乎席卷了美国每一州的每一城市。据美国官方統

計，从五月中旬到七月底，在美国三十多个州的一百八十六个城市里，至少爆发了七百五十八起黑人示威。八月，全国黑人的斗争更是进入高潮。八月二十八日，十个黑人团体发起的全国性的向华盛顿“自由进军”，共有来自全国各州以及从海外各地专程回到美国来参加示威的黑人代表二十五万多人参加。据美国《新聞周刊》調查，在全部美国黑人中，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参加过不同形式的示威，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参加了对实行种族歧視的白人商店的抵制。

黑人斗争規模的空前强大，显示了美国黑人和美国劳动人民的新覺醒，显示了他們斗争的力量和决心。

对于黑人的斗争，美国統治階級除了采取欺騙的手法外，还同时用暴力的手段进行鎮压。

面对着美国統治集团的殘暴的鎮压和屠杀，黑人当中的一些上层分子竭力鼓吹用非暴力手段“解除敌人的武装”，“影响敌人的良心”。但是，随着黑人无产阶级队伍的日益扩大，随着斗争的步步深入，黑人开始懂得必需以暴力来回击反动政府、种族主义者的暴力。就如美国黑人領袖罗伯特·威廉所說的：“向压迫者的良心恳求，是不能解脫压迫的絞索的。要对种族压迫这样根本性的問題进行社会变革，就需要用暴力。”

黑人工人越来越意識到爭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同整个工人階級的解放的斗争的密切联系。尽管有着种种的阻难和歧視，黑人工人加入工会組織的人数仍在不断增加。目前，黑人的工会會員已經超过二百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一九六〇年五月，在底特律召开了全国黑人劳工代表會議，这标志着黑人在工人运动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各种黑人群众性的組織，特别是黑人工人的組織，不仅是爭取黑人民主权利的巨大力量，而且是工人运动的一支不可忽視的主力。正如已故的美国共产党領袖福斯特所說的：“一千八百万黑人是美国工人階級中最具有斗争性的部分”。美国黑人的斗争首先是包括白人在内的美国无产阶级反对壟断资产階級的斗争的一个偉大的組成部分。



同样，美国黑人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斗争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联系，同全世界人民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同全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联系。美国黑人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思想正在增长，越来越多的黑人日益关心被压迫兄弟的斗争。例如：刚果总理卢蒙巴被害以后，纽约黑人在联合国大厦举行愤怒的抗议示威；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在哈勒姆黑人区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一九六三年五月在伯明翰城示威的黑人，高呼着非洲人要求自由的口号“乌呼鲁”；七月，哈勒姆区的黑人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的办公室内举行静坐示威，反对美国用武器帮助葡萄牙独裁政府镇压非洲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斗争，要求把实行种族隔离制的南非联邦政府驱逐出联合国。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说得对：“广大的美国黑人必将同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兄弟们在共同斗争中进一步加强团结，互相支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人也阻碍不了的。”

黑人必胜，美帝国主义必败！

美国黑人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

在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白人参加和支援黑人的斗争。在美国黑人斗争中，曾经出现过许多黑人、白人、印地安人联合起来反对共同压迫者的事实。美国最早出现的废奴社这个组织，就是以黑人白人合作为基础的。远在十九世纪初，当大批黑人奴隶从种植园有组织地逃亡时，许多倾向民主思想的白人组成了“车站”（同情废奴主义者的家宅），让过路的黑人可以停留。为了黑人的解放，不少白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名的约翰·布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一八五九年由于亲自领导了黑人奴隶的起义而被绞死。二十世纪以来，更多的白人劳动者同黑人劳动者团结起来，为反对他们的共同剥削者而斗争。在近年来的许多次大罢工中，他们都提出了取消在就业、工资和福利待遇等方面对黑人工人的歧视作法的要求。一九六三年的“自由进军”斗争

中，有不少白人参加了示威的行列。美国统治集团妄图分化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团结的阴谋越来越不得逞了。反动工会头目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行径越来越被识穿了。马克思早就指出：“劳动在黑皮肤上打着火印的地方，无论如何也不能在白皮肤上得到解放。”^①美国的白人工人、劳动人民以及所有正直的白人在自己的斗争中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真理。

黑人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黑人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争取人民民主、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黑人的斗争揭露了打着“民主”、“自由”、“和平”的幌子的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它不仅大大提高了美国黑人的觉悟，而且也提高了全世界人民，特别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美帝国主义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政策，是它对待国内黑人政策的继续。十九世纪，美国就曾经利用所谓“遣返”黑人奴隶的幌子，在西非建立了利比里亚，使它变成美国的殖民地。现在，美国政府一方面在非洲大搞所谓“攀亲戚”、“和平队”等等的活动，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反对种族歧视的战士”，而美国统治阶级在国内却残酷地剥削和镇压黑人，甚至连非洲国家驻在华盛顿的外交人员也由于肤色不同而遭受歧视，这就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者是十足的种族主义者，所谓“攀亲戚”、“和平队”不过是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替代英、法、比等老殖民主义者而玩弄的新殖民主义的花招而已。黑人在帝国主义的堡垒美国进行的这一斗争所取得的每一点权利，将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胜利，是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一切力量的胜利。黑人的斗争，是对全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巨大支持，是对社会主义各国的巨大支持。因此，黑人的斗争，一直得到全世界进步人民的支持和声援。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呼吁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12页。



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不仅代表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心声，而且体现了全世界人民的意愿。因此，毛泽东同志的声明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热烈的欢迎和赞同。

在全世界人民坚决支持和声援美国黑人的斗争中，一心讨好美帝国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却扮演了一个可耻的角色。他们不敢把黑人问题同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联结起来，不敢把民族问题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尽量缩小美国黑人斗争对全世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斗争的意义。他们不是去支持黑人的英勇斗争，反而同美帝国主义相配合，大肆散布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幻想，要求黑人在争取权利平等的斗争中采取“忍耐”态度。他们大力为美国统治阶级的“象征主义”、“渐进主义”的欺詐手法塗脂抹粉，大力鼓吹“黑人利用非暴力斗争的方法进行革命”。他们说，现在在美国上空刮起了一阵“清風”，种族主义精神将被清除，黑人的代表有可能被选入管理机关、法院和州的立法机构，黑人将担任州长、議員。这样，“便将出现美国全部生活的普遍民主化”。他们甚至誣蔑坚决斗争的黑人是“种族主义分裂分子”，誣蔑支持黑人斗争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挑撥黑人和白人的关系。

我们在上面已经论述过，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是决不会放棄种族歧视这一有利于他们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政策，作为垄断资本的走狗，不論是肯尼迪，在肯尼迪以前的杜魯門、艾森豪威尔，还是在肯尼迪以后的約翰逊，他们都不可能改变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政策。这是阶级的本质所决定了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适应美国帝国主义的需耍，对于黑人的斗争发出如此恶毒的攻击，进一步暴露出他们只不过是帮助美国垄断资本掠夺和压迫黑人的奴僕。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发出响彻云霄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四十多年前，当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列宁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今天，毛泽东同志向全世界人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的声明，正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当前的国际形势提出来的。这一声明表明，美国帝国主义越来越孤立了，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越来越扩大了。

在这种大好的形势面前，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都坚信，黑人必胜，美国帝国主义必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阻擋不了历史的车輪。他们是少数。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

美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領袖福斯特在生前以极大的热情贊美了黑人的正义斗争。他说：“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这些勇敢民族已经再接再厉重新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这一次斗争是为了争取民族的解放，他们新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有着新的口号、武器和策略，并且得到世界上社会主义和民主国家自由人民越来越多的支持。他们对压迫者进行斗争的前途毫无问题要取得彻底的胜利。”

这是真正美国无产阶级的声音，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声音！

非洲黑人的今天正是美国黑人的明天。自从殖民主义者侵入非洲的第一天起，四百多年来，非洲人民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经过多年的斗争，现在，反帝的浪潮已经席卷着整个非洲大陆，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获得了独立地位，接着，他们又为捍卫国家主权、巩固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那些还处于殖民主义桎梏下的非洲人民，欢庆解放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黑人的觉醒，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寿命告終的重要标志。非洲的彻底解放，将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失去它最后的殖民堡垒；美国黑人斗争的胜利，又将使美帝国主义从削弱而走向灭亡。这是历史早已給帝国主义安排好了的命运。



阶级斗争的生动教材

——读《红色堡垒》

黄秋耘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于青年一代，我们既需要进行革命前途的教育，也需要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

今天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对于旧中国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白色恐怖的严重，革命斗争的艰辛，知道得很少。他们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为什么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具备怎样的革命品质，怎样才能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工人阶级战士等等问题，都还不甚了解，或许有人懂得一些一般的道理，但也说不上有具体的体会和感受。因此，以某一个工厂的实际斗争为内容，编写一些历史性的资料，以生动、具体、真人真事的典型事例，系统地教育青年一代，是一

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作。

以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的工人斗争历史为题材的工厂史《红色堡垒》（中共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委员会厂史办公室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就是一本内容丰富的阶级斗争的活教材。

《红色堡垒》从一八七九年上海有第一盏电灯开始，一直写在一九六〇年为止，它所写的虽然只是一个发电厂的斗争史，但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

斗争。在解放前几十年当中，英、美和日本帝国主义者都先后当过这个发电厂的主人，他们疯狂地榨取中国工人的血汗，剥夺中国工人的权利，限制中国工人的活动，一个比一个凶狠，一个比一个残酷，一个比一个狡猾。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英勇顽强的中国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者和他们忠实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创造了一套适合于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极其灵活而巧妙的斗争形式。不论是那个蛮不讲理的英国“强盗”诺登斯也好，还是那个假仁假义、口蜜腹剑的美国“老江湖”乔亨也好，不论是那个狼狗似的日本“萝卜头”山本也好，还是那个狐狸似的国民党反动头子吴开先也好，在英勇顽强的中国工人阶级面前，都束手无策，一败涂地。

在《红色堡垒》中，斗争的几个主要回合，都写得有声有色，奕奕动人。

在上海沦陷后的头几年，市中心的“租界”已成为日寇包围中的“孤岛”，在发电厂内，美国鬼子又订立了许多对付工人的条例，像一根根绳子似的把工人们捆得紧紧的。在这样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发电厂的工人巧妙地利用日、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站稳脚跟，团结群众，开展活动。不能做公开的抗日工作，他们就搞“节约救难”，把募捐得来的钱，一部分救济流亡难民，一部分秘密支援新四军。不能做公开的宣传工作，他们就蹲在厕所里读报，在驳船上“听听消息，讲讲六道”。不能组织工会，他们就办消费合作社，通过卖油盐酱醋，送煤球上门，搞熟人头，在工人兄弟中间做说服教育工作，把大伙拧成一股绳。结果，团结在党周围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革命力量也一天比一天壮大起来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鬼子占领了“租界”，拿下了发电厂，压迫越来越厉害，斗争也越来越艰苦。日本鬼子不但穷凶极恶，而且阴险无比。他们动不动就派出荷枪实弹的武装部队，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如临大敌地威胁



工人，鎮壓工人，同时还利用工賊作釣餌，來尋找工人鬥爭的領導者加以迫害。針對着這種情況，發電廠的地下黨支部，領導工人們巧妙地採取無組織形式的有組織鬥爭來對付鬼子；而且在鬥爭中“得到風，就轉篷”，不硬鬥下去。這種靈活的鬥爭策略很快就取得了輝煌的戰果。鬼子強迫工人們過門時向門崗鞠躬敬禮，工人們就排成一條半里路長的長龍，一個挨一個慢騰騰地給他們“鞠躬”，把上工的時間捱磨過去，迫得鬼子只好自動收回成命。工人們鬧罷工，要求增加工資，鬼子原想叫工人推出代表來談判，然後下毒手逐個逮捕。但是工人既不派代表，也不回去工作。鬼子胡亂抓了十幾個人。工人們就擠在廣場上席地而坐，大聲叫着：“不放人，我們不撤！”鬼子偷偷派工賊混到工人隊伍里，煽動工人推舉代表去談判，以便找出工人的頭兒，可是工人們早就識破了這一陰謀詭計，索性推舉這個工賊去當代表。這場“無頭鬥爭”，斗得鬼子暈頭轉向，一籌莫展，最後只好低頭認輸，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宣布放人、加薪。

這一系列鬥爭的勝利，都是發電廠地下黨堅決執行毛澤東同志手訂的滄陷區工作方針：“蔭蔽精干、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結果。正因為嚴格照着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事，他們才能在這樣險惡的環境中履險如夷，克服障礙，把不利的因素轉變成有利的因素。

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除了卷土重來的美國老板外，發電廠工人又增添了一個凶狠狡猾的敵人，那就是國民黨反动派。而且當時美國老板已經改變了不讓國民黨官員在他的公司里插足的主意，決定同國民黨政府狼狽為奸，共同對付他們的眼中釘——中國工人階級。

不過，在飽經考驗的發電廠工人面前，國民黨反动派是占不到什麼便宜的。不論在選舉工會委員的競選活動中，還是在“九日入夜”的罷工鬥爭中，他們都顯得完全不是發電廠工人的敵手。最後，連偽市長的住宅和偽社會局的用電都給發電廠工人停掉了，這些反动頭子感到事態越來越嚴重，要是罷工再擴大開來，就更難於收拾，只好

无可奈何地承認失敗，接受了工人們提出的全部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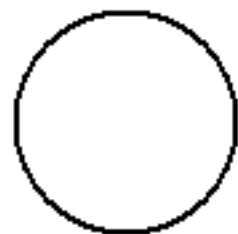
當然，取得這場鬥爭的勝利是極不容易的，如果發電廠的黨組織不是依照上級黨的指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爭取中間派，打擊反动派，把絕大多數群眾緊密團結在黨的周圍，在鬥爭中壯大和發展自己的力量，決不可能那麼順利地打退了美國老板和國民黨反动派的聯合進攻。在《對壘》和《九日入夜》兩章中，《紅色堡壘》一書極其生動地描繪了地下黨領導這場群眾鬥爭的卓越的領導藝術。

《紅色堡壘》不但寫到鬥爭勝利的成功經驗，也寫到鬥爭失敗的慘痛教訓。一九四七年夏天，發電廠有六個工會幹部在“富通印刷所”被捕。國民黨特務組織準備以“富通事件”為借口，向上海工人階級展開新的進攻。發電廠黨組織在分析形勢、估計情況以後，本來不主張“硬拚”，可是當時有個別黨員工會幹部卻擅自違背黨組織的決定，先是發動工人包圍偽社會局請願，要偽社會局長吳開先放人；後來在國民黨反动派的武裝威脅和謠言的欺騙下，又草草收兵，向工人宣布立即撤退。這一來，敵人就把主動權奪過去了，馬上開始一個大規模的迫害，解散了原來的工會，下命令通緝原來的工會幹部。發電廠的資方也配合行動，把被捕的和被通緝的職工全部開除了。

從這次慘痛的失敗可以看得出來，任何革命鬥爭，只要離開了黨的正确路線，就一定會受到挫折，遭到損失。

黨組織總結了這次鬥爭失敗的教訓，制定了新的戰鬥部署。決定讓已經暴露了的同志，暫時撤退；原來在第二線工作的同志，站到鬥爭的第一線。這時，共產黨員王孝和挺身而出，打入了敵人新成立的偽工會，擔任了委員的職務。王孝和同志利用這個合法的身份，積極而又巧妙地組織群眾與敵人展開了面對面的鬥爭。在這一場鬥爭中，王孝和同志由於敵人的野蠻鎮壓而英勇就義了，但他那高大的形象和光輝的一生，却永遠活在人們的心里。《紅色堡壘》一書，給我們寫出這個光輝的共產黨員的形象，對廣大讀者是有教育意義的。

《紅色堡壘》在敘述每個階段的群眾鬥爭時，把黨的



领导这条红线，贯串在整个斗争的过程中，充分反映出党和工人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从而达到了一定的思想高度。

《红色堡垒》是杨村发电厂工人斗争历史的光辉纪录，是一本阶级斗争的活教材。由于它基本上是采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来写的，在原始史料上做了不少艺术加工，语言比较清新活泼，细节描写比较细致生动，人物形象也比较鲜明突出，既能真实地反映出历史面貌，又具有较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高尔基就提倡过编写工厂史的

工作，他亲自组织一些作家来参加这个工作，并且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表扬了两位积极分子。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出版了不少工厂史，有一些是写得很不错的，《红色堡垒》就是其中的一部。我们热烈地希望更多的作家、更多的工业战线上的业余作者来参加编写工厂史的工作。不妨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写，有的可以写成报告文学作品，有的可以写成经济调查报告，有的可以写成史料，把编写工厂史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写出更多的真实而又生动的阶级斗争教科书。

大写社会主义英雄谱

——读《武钢建设史话》

宋爽

一九五八年以来，全国各地许多厂、矿进行了群众性的编写厂、矿史工作，陆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著作，它们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工人阶级成长壮大和英勇斗争的历史。但是，以绝大部分篇幅，连贯地、广泛地描述社会主义工业巨大建设过程的作品，表现这一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写出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谱的厂、矿史还不多。《武钢建设史话》（武钢厂史编委会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出现，为这方面的厂、矿史写作，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经验。

这部史话的内容几乎包括了从勘探厂址、勘测、设计、施工到建成两座高炉、三座焦炉和其他一些生产单位投入生产的全部过程。这一过程是由许多斗争生活场景和色彩壮丽的劳动画面组成的。这部史话的绝大部分篇章，都是由活跃在武钢钢铁公司建设中各种不同工作岗位上的职工

群众编写的。他们所写的几乎都是亲身经历过的生活片断，都是在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的斗争中自己的思想感受；有些以今昔对比的手法写下的篇章，也常常是一首新时代的赞歌。许多生活场景连结起来，构成了武钢建设过程中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从这部史话里，我们所得到的教益，不限于对武钢建设的发展历史和概貌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十分亲切地感受到，我国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表现出来的英勇豪迈、富有创造性的劳动热情，和他们崇高的革命风格。

《武钢建设史话》在描述武钢这个新型的钢铁基地的成长过程中，记下了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和先进集体的光辉业绩；写出了他们蔑视困难，战胜困难，在困难中大显身手的革命精神，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

我们不会忘记，一九五四年严冬，勘察队员在冰天雪



地里的战斗情景。他們住在“既挡不住風，也遮不住雪”的茅舍里，“早晨起来的时候，屋子里就堆滿了半尺深的积雪，被子上盖有寸把厚的雪花，大家的头发上都挂上了一层白霜”，根本没法入睡；可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們次日緊張的战斗。大風雪封住了道路、河流，電話綫也被刮断了，出現了断粮断柴的危机，在这种艰險的情况下，他們就用褲子当粮袋，顶着風雪去背粮。風雪越大，斗志越高，他們經住了严冬的考驗。一位勘察队员说：“严冬輸給我們了！”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

我們不会忘記《神話將要变成现实》中描述的唐宝林这个人物。当他剛来到勘探队的时候，“連字还认不到几个，見到钻探机，光听到嗡嗡响，不知为什么响。老工人指着机器告訴他：‘不能靠近机器皮帶，那有被卷在机器上的危險；不能到柴油机附近走，那有滑倒跌在机器上的危險，……’”这个危險，那个危險，沒有吓倒他，只是使他更加努力地去学习和掌握勘探工作中各种复杂的現代化技术。如何掌握呢？他“注意看着別人怎样操作，有时別人下了班，他还是盯着看。……他不仅要看它，而且要学着拆卸它。他一面拆，一面对图样看，这样很快就熟悉了机器的性能，掌握了机器”，而且学会了根据机器的响声，察觉与防止事故的发生，成为二十七号钻班班长。

我們不会忘記，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浪涛中涌现出来的征服困难的各种先进人物和先进小组。一个普通的木工王荣，冲破重重困难，沒花一文錢就办了一座木材加工厂，而且先后制成了圓鋸、截口机、多面刨等七八种机械。矿山工地上的爆破班长李英仁，經歷一百零五次試驗的艰难历程，創制了一种“防水炸药”，解决了雨天不能爆炸的难关，保证了武鋼高炉的正常生产。钳工出身的技师吳紹秀，經過十几次試驗，终于制成了活动筛条机。……所有这些生产技术上的革新、創造，都生动地反映出先进人物不計較个人得失，千方百計地同困难作斗争的精神面貌。一个问题沒有解决，他們心情总是不平靜。他們心里有一股改变中国“一窮二白”面貌的热情，

要干，要革命。领导上对这些先进人物也大力支持，每当他們試驗失败的时候，总是鼓励他們：“今天不成功，明天就会成功，要多給群众鼓励，要多替大家出題目，让思想开闊一些，解决问题就更快了。”工人同志們自己也認識到：“要革好命就得苦干实干，自动化的机器是慢慢試成功的，失败一次再来一次，有了教訓才能够胜利。”每当試驗失败，有人主張退却的时候，干部和积极分子也总是鼓励大家总结經驗，更好地前进。

各种各样的先进小组和先进人物，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在武鋼建設工地上，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职工，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使許多工程的工期一再縮短和提前，保证了武鋼建設以高速度向前发展。請看，为了爭取提前建成一号焦炉、保证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出焦的斗争图景：“工地沸騰了。三十七度以上的高温，动搖不了建設者們的决心，狂風暴雨或夜幕降临，亦不影响上下交叉的立体作业。”工人們就像賽跑一样，你追我赶：“前面打好基础，后面就立起了支架，下面安上煤气管道，上面又架起了蒸气管网，一組工人跟着一組工人，一个工序連着一个工序。”这种群众性的竞赛运动，不但使一号焦炉系統工程提前全部竣工，也促进了其他工程建設的发展速度。而且就在这种一浪高一浪的竞赛过程中，培养、鍛炼出一支具有高度觉悟和能打硬仗的新的建設大軍。他們苦干巧干，刻苦学习，勇于創造；在各单位之間、人与人之间，大兴共产主义协作之風；做到困难留给自己，方便让給別人，以集体为重，助人为乐……充分发挥了共产主义的劳动热情。正是这种忘我的冲天干劲，不断地創造出光輝灿烂的成果。

三

树有根，水有源。究竟一股什么力量，使武鋼职工把这样一个近代化的、大规模的钢铁联合企业，能以最快的速度兴建起来呢？这在《武鋼建設史話》中，做了多方面的描写和說明。



从史話中可以看到，党对武鋼的建設是无比关怀的。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毛澤东同志亲手批准了在华中地区建立一座大型鋼鐵联合企业的計划，这使武鋼建設者們得到了很大的鼓舞，因为这預示了祖国的第二个鋼鐵基地即将誕生，預示了祖国的工业面貌将发生又一次重大变化。当武鋼一号焦炉开始場地平整工程的时候，中共湖北省委的負責同志，就前来焦炉工地参加体力劳动。一号高炉出铁那天，我們偉大的領袖毛澤东同志，又亲自前来参观出铁，并和許多英雄模范見了面，使武鋼建設者們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工业安装公司高炉女电焊工吳潤梅，在《最大的幸福》一文中，以激动的笔墨写出了这样的心情：“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最难忘的一天，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想起了毛主席，就有了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我要把一切力量献给党，創造更大的成績”。岂止一个吳潤梅，武鋼好几万职工，在党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无不如此。

在武鋼建設的过程中，中央有关各部和全国許多单位，为建設武鋼展开了大規模的工作，全国人民从四面八方来支援武鋼。这方面的动人事例，在史話中也記載了不少，而且写得有情有景，有声有色。像《千里长空送器材》所描写的故事，就是一例。解放軍空軍某部，为了支援武鋼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出焦，十月一日出铁，特从哈尔滨給武鋼赶运一个五吨多重的减速器。在运送途中，他們冒了极大的風險，表现了极大的英雄气魄。《紅領巾螺絲釘》是一篇很短的文章，却描述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江苏省崇明县豐濱小学少先队员們，給武鋼全体工人叔叔写了一封信，还寄上了九元五角四分錢，信上說，他們开展了一次拾稻穗活动，一共拾得稻谷一百一十三斤，卖给粮食站得到这笔錢，經過大队热烈的討論，决定把这笔錢支援武鋼建設。信上又說：“工人叔叔，請你們收下吧！虽然这么一点点錢，也算表示我們全体紅領巾对祖国建設的心意，那怕是給你們买一些螺絲釘也好。”……各种各样的支援，大大小小的动人故事，表现了个人、集体和国家血

肉相联的崭新关系，鼓舞着武鋼建設者們一再向前跃进。

四

武鋼是我国第二个近代化的大規模的鋼鐵联合企业。这个鋼鐵联合企业的建設历史，就是我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发揚革命精神，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偉大理想而奋斗的一頁历史。武鋼的建設者們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貢獻了巨大的力量的同时，又写出了这样一部内容丰富、真实动人的史話，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情。

开国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工人阶级以奋发图強、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在工业战线上持續不断地創造了輝煌灿烂的成就。这种成就，以及創造这种成就的上千上万的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时代工人阶级活的榜样，是对我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一代进行革命前途教育、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思想侵蚀的活的教材。

为此，我們应该运用各种各样的文艺体裁，大写社会主义英雄譜。我們需要創作更多反映这些英雄人物的斗争生活的、概括性更高、更集中、更典型的小說、戏剧、曲艺，也需要創作更多反映工业战线上的英雄人物的真人真事的、及时而生动的报告文学。要通过报告文学，形象地写出这些英雄人物的光輝事迹，写出他們的精神面貌、革命思想、革命干劲和崇高風格，让这些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和先进思想在人民群众中广为傳播，生根开花。作家应当参加这样的工作，各厂矿企业广大职工群众热情地编写这样的英雄譜，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广大职工群众在描写了社会主义劳动的英雄場面，歌颂了本厂、本矿的英雄模范人物之后，必将促使他們更有信心，更有創造性地为建設祖国而劳动。编写这样的英雄譜，可以像武鋼那样有組織有計划地写成連貫性的大部头的史話，也可以写成单篇的报告文学或其他形式的作品。让报告文学在各地厂、矿企业中遍地开花，努力編写出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譜。



怎样理解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和实践标准？

——与何祚庥同志商榷

陶 德 麟

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和实践标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何祚庥同志在他的几篇文章^①中作了论述，引起了讨论。我过去也曾就祚庥同志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提出过一些初步的商榷^②。本文拟就上述问题再谈谈我的意见，并向何祚庥同志和其他同志请教，以便通过讨论获得比较正确的认识。

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何祚庥同志对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概念是这样解释的：

“绝对真理是全面而又完善的认识，它不会为后来的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所否定。相对真理也是基本上正确反映客观现实的知识，但这只是不完全的、在一定界限内、一定条件下反映客观现实的知识。这种知识将在科学往后的发展中不断进行修改、补充并日益深化、精确和具体。”^③

“要把绝对真理理解为全面而又完善的真理，并把相对真理理解为不甚全面、不甚完善的真理。”^④

这种说法是把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了解为两种不同的真理。与此相应，祚庥同志也就把真理分成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两类。例如，他认为像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这样的

真理，就属于绝对真理一类；而像牛顿力学定律这样的真理，就属于相对真理一类。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真理是客观对象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世界上只有一种真理——客观真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这两个概念，并不是用来表示两种不同的真理的，而是用来表示同一个客观真理的两重不同的属性的。我们不能说，某些真理只是绝对真理而不是相对真理，某些真理又只是相对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而只能说，客观真理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来是绝对真理，从另一意义上说来又是相对真理。

从什么意义上说来客观真理是相对真理呢？

第一，任何真理总是对一定具体对象的正确反映，这个具体对象总是整个宇宙的一个部分或一个侧面，这个部分或侧面本身是

① 何祚庥同志就这个问题发表过三篇文章：（1）《论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问题》（见《红旗》1962年第2期）；（2）《不能离开历史观点理解实践标准》（见《新建设》1962年11月号）；（3）《论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见《文汇报》1963年8月6日第4版）。以下在引用这些文章中的话时，只注明刊物名称和页码，不注篇名。

② 见《新建设》1963年10月号《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几个问题》一文。

③④ 《新建设》1962年11月号，第37、42页。



相对的，因而作为它的正确反映的客观真理也就是相对真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①

第二，任何具体对象都具有无限多的方面和联系，具有无限多等级的本质，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获得的正确认识总不可能穷尽地反映出对象的一切，总还有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余地，因而，即使仅仅就一个特定的对象来说，人们的认识也只能相对正确地反映它，只能是相对真理。正如列宁所说的：“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②。

从以上两种意义来看，任何客观真理都是相对真理，并没有例外。就拿被祚麻同志仅仅看作绝对真理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来看吧，也是相对真理。一则，它所反映的并不是整个宇宙的一切，而仅仅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特定的对象（各种能量形式之间的联系）；二则，它对这种特定对象的反映也并没有穷尽它的一切，也还有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余地（恩格斯明确地指出过：“我们可以给它提供新证据，提供新的更丰富的内容。”^③）。

从什么意义上说来客观真理又是绝对真理呢？

第一，尽管真理的内容总是整个宇宙的一个相对的部分，但是这个相对的部分却是绝对永恒的物质世界的一个部分，它具有绝对物的本性，因而人们的正确认识也就具有绝对真理的本性，就是绝对真理的一个部

分。恩格斯说：“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这种认识在本质上是绝对的。”^④列宁引证狄慈根的话说：“我们只能相对地认识自然界和它的各个部分；因为每一个部分，虽然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相对的部分，然而却具有绝对物的本性，具有认识所不可穷尽的自在的自然整体的本性”^⑤。

第二，尽管任何真理都不能穷尽地反映出对象的一切，都有待于深化和发展，但是它既然是客观真理，那么它在同它所反映的一定客观对象相符合这一点上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列宁说：“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⑥他在说到马克思的货币流通理论时说：“这个理论和实践的符合，是不能被将来任何情况所改变的，其原因很简单，正如拿破仑死于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是个永恒的真理一样。”^⑦

从以上两种意义来看，任何客观真理都是绝对真理（确切些说，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也没有例外。就拿被祚麻同志仅仅看作相对真理的牛顿力学定律来看吧，这也是绝对真理。一则，它所反映的对象（宏观物体的低速运动）是绝对的物质世界的一个部分，具有绝对的物质世界的本性；二则，它同它所反映的对象之间的符合也是无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4页。

②⑤⑥⑦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77、134、135、143页。

③④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7、195页。



由此可見，只有相对性而无绝对性、或者只有绝对性而无相对性的真理是没有的。任何客观真理都同时具有相对性和绝对性，同时既是相对真理又是绝对真理。正因为这样，我們才可以理解为什么“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沟”^①，为什么“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②，为什么“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③ 如果认为有些真理仅仅是相对真理而不同时又是绝对真理，就无从說明这些真理的客观性（因为“否定绝对真理而不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是不可能的。”^④）；如果认为有些真理仅仅是绝对真理而不同时又是相对真理，就无从說明这些真理深化和发展的必要与可能。这样，就既不能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又不能同形而上学划清界限。

何况，按照祚麻同志所提出的那些标志来划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实际也划不清楚。我們不妨簡略地分析一下：

（一）以“全面”和“完善”的程度为标志。

祚麻同志說，绝对真理是“全面而又完善的”或“十分完善的”^⑤，而相对真理則是“不甚全面、不甚完善的”。这个标志是相当含混的。怎样才算是“全面而又完善”或“十分完善”，怎样又算是“不甚全面、不甚完善”呢？这条界限应该怎么划法呢？祚麻同志自己也說不清楚。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全面”和“完善”本来就是相对的。我們很容易指出一种真理比另一种真理更全面、更完善，但是我們永远无法指出哪一种真理就全面和完善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能量守恒和轉化定律是被祚麻同志算作绝对真理的，應該是“十分完善”的了。可是祚麻同志也并不能

证明它就永远不可能再深化和发展。

（二）以是否“在一定界限內、一定条件下反映客观现实”为标志。

祚麻同志說，相对真理只是“在一定界限內、一定条件下反映客观现实”的真理。这句话完全正确。不过我們很自然地会提出一个问题：绝对真理是不是“在一定界限內、一定条件下反映客观现实”的真理呢？如果也是，那么把“在一定界限內、一定条件下反映客观现实”这一点作为相对真理的特点而写到相对真理的定义里去就沒有意义了，按照这一点来区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就区分不清了。如果不是，那就是說绝对真理是一种超出任何界限、超出任何条件而反映客观现实的真理了。可是我們都知道，这样的“真理”是没有的。如果一定要认为只有这样的“真理”才算绝对真理，那就无异乎否认了绝对真理的存在。

（三）以会不会被“否定”为标志。

祚麻同志說，绝对真理“不会为后来的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所否定”。这句话也同样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我們又会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相对真理会不会被后来的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所否定呢？如果认为相对真理也不会被否定，那么把这一点作为绝对真理区别于相对真理的标志就不合邏輯了，按照这一点来区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也就区分不清了。如果认为相对真理可以被否定，那就是說相对真理根本不是真理了。因为正如我們大家都知道的，真理同对象的符合是无条

①②④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5、133、120頁。

③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第284頁。

⑤ 《文汇报》1963年8月6日，第4版。



件的，是不会被将来的任何情况所改变的；如果有一种“真理”竟然被科学和实践的发展否定了，那就只能说明它根本不是真理。

仍以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为例。祚麻同志论证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绝对真理的唯一理由，就是它“不再会被科学的发展所推翻”^①。可是试问：牛顿力学定律会不会被“推翻”呢？如果说：也不会被推翻，那就应当承认牛顿力学定律也是绝对真理了；可是祚麻同志不承认它是绝对真理，只承认它是相对真理。如果说：牛顿力学可以被推翻（全部地或部分地），那就应当承认牛顿力学全部是错误或者包含着错误了；可是祚麻同志又坚决反对相对真理全部是错误或者包含着错误的观点。这就真难办了！

尤其使人糊涂的是：祚麻同志甚至连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未来命运也似乎并没有充分的信心，他说：“当然，如果有人一定要怀疑在某个遥远的星球上，有着某种能量不守恒的过程，那我们也仍然是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来加以反对的。”^②这就是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在将来是否会遭到如同牛顿力学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出现以后所遭到的那样的命运，他也不敢断言。既然如此，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同牛顿力学定律在这一点上究竟有什么“质的区别”呢？祚麻同志究竟根据什么把一个仅仅叫做绝对真理，一个仅仅叫做相对真理呢？

总之，如果我们承认把真理分为两类的做法，那么我想至少应该要求祚麻同志提出一种能够把两类真理区分开来的标志。可是如上面所分析的，当我们按照祚麻同志提出的标志来对真理实行分类的时候，我们却碰到一连串的自相矛盾，越分越糊涂。这说明

什么问题呢？我想，这说明了真理分类法根本行不通。

其实，如果仅仅是论述上的自相矛盾，那还是比较次要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改进论述的方法。问题在于：在这种自相矛盾的论述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祚麻同志确实认为相对真理是可以被否定的；不过不是全部被否定，而是部分地被否定罢了。固然，祚麻同志在字面上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写出“相对真理可以部分地被否定”这样的话，但是，从他的大量的论述和所举的例证来看，我们不得不认为他在实际上是这样看的。例如，他在论证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绝对真理的时候所持的理由，就是这个定律“不再会被科学的发展所推翻”^③，这岂不就等于说相对真理是不免会被推翻（至少是部分地被推翻）的么？又如，他说：“凡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都是客观真理，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特别是那些已有大量的科学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所包含的绝对真理的成分也就越多。这种已经有大量实践为基础的绝对真理的成分，是不会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消失的。”^④这不是明确地肯定了客观真理当中只有一部分不会“消失”，而另一部分却会“消失”么？这不是说相对真理可以部分地被否定么？

说相对真理可以部分地被否定或推翻，那就要对这一部分可以被否定或推翻的东西的性质作出明确的说明。这一部分东西究竟是什么？是错误，还是真理呢？

也许是错误吧。这就是说，相对真理当

①②③ 《新建设》1962年11月号，第43、43—44、43页。

④ 《红旗》1962年第2期，第23页。



中是包含着錯誤的，相对真理就是由绝对真理的成分和錯誤构成的。有些同志是这样认为的。但我认为这种意見是不对的。我們在这里說的不是一般的認識，也不是一般的科学理論，而正是真理。說認識中或科学理論中包含着錯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認識中或科学理論中完全可能既有同客观对象相符合的部分，也有同客观对象不符合的部分，前者是真理，后者是錯誤。但是，說相对真理中包含着錯誤就不对了。对于一个确定的客观对象來說，真理同錯誤的界限是绝对的。只有同对象相符合的認識才能叫做真理，同对象不相符合的認識就不能叫做真理。我們怎么能把同对象相符合的部分同不相符合的部分加在一起叫做真理呢？这样做，真理和錯誤还有什么界限呢？真理和錯誤这两个概念还有什么确定的涵义呢？事实上，祚麻同志也一再申明他并不同意相对真理包含錯誤的观点，他也說他认为相对真理“仍是正确反映客观实际、不包含錯誤的真理。”^①

那么，也許相对真理中那个可以被否定或推翻的部分也是真理吧。但是这样一来問題就更大。真理竟然被否定了。同某一个对象相符合的認識竟然与同一个对象不相符合了。这真是不可想像的怪事！列宁不是明明告訴我們：真理同对象之間的符合是不能被将来的任何情况所改变的么？真理是不会被否定的，被否定了的就不是真理。这不是非常清楚的道理么？

可見，無論把这一部分可以被否定的东西說成是錯誤或者說成是真理，都是說不通的。那么究竟怎样理解这一部分东西呢？难道世界上有什么既不是錯誤、又不是真理的“中性”的認識么？

也許祚麻同志會說，这一部分东西是“不甚精确、不甚完善”的認識^①，但是，这也还是取消不了这样的問題：这种“不甚精确、不甚完善”的認識究竟是否同对象相符合？如果所謂“不甚精确、不甚完善”就是指的同对象不相符合，那么这种認識就是錯誤，那就还是实际上承认了相对真理包含錯誤。如果所謂“不甚精确、不甚完善”不是指的同对象不相符合，而只是指的不甚深刻，那么这种認識就仍然是真理（因为一种認識尽管不深刻，但只要它同对象相符合，我們就得承认它是真理），說这样的認識会被否定，就无异乎說真理会被否定。可見，“不甚精确、不甚完善”的概念仍然不能帮助我們摆脱上述的困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像祚麻同志那样认为相对真理可以部分地被否定，那就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承认相对真理包含錯誤，或者是承认真理可以被否定。但是，这两种答案都很难令人同意。所以我认为，相对真理可以部分地被否定的說法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祚麻同志得出了相对真理可以部分地被否定的結論呢？我认为，这是由于他对科学史上的复杂現象作了不完全恰当的解釋的緣故。

一切科学原理都在变化着。这是科学史上的基本事实。但是，如何理解这种变化呢？这是需要具体分析。我的初步意見是，科学原理的变化（指前进的变化）可以归结为如下四种基本的情况：（1）某一科学原理全部錯誤，因而在后来全部被否定；（2）科学原理中的錯誤部分被糾正；（3）科学原理中

^① 《文汇报》1963年8月6日，第4版。



的正确部分被深化；(4)科学原理中正确部分的适用界限被重新规定(扩张或缩小)。在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下，被否定的东西是错误，而错误并不是相对真理或相对真理的组成部分；在第三种情况下，相对真理是变得更深刻了，但原来的比较不深刻的真理也并没有被否定；在第四种情况下，被否定的东西并不是相对真理的客观内容，而仅仅是前人对于相对真理的适用界限的规定，这种被否定了的规定恰恰不是真理，而是错误。由此可见，无论就哪一种情况看，都得出相对真理可以全部地或者部分地被否定的结论。

拿祚麻同志所举的牛顿力学发展为相对论的例子来看吧。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的发展实际上包括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人们原来以为牛顿力学是适用于一切物体的运动的，后来新的实践表明它只适用于宏观物体的低速运动，而不适用于微观客体的运动或接近光速的运动，这就是说，人们发现原来对它的适用界限的规定是错了，需要重新规定；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牛顿力学的公式对于宏观低速运动的反映不如相对论的公式那么精确和深刻。但是，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作为相对真理的牛顿力学全部地或者部分地被否定了呢？在我看来是不能的。因为从前一个方面说来，被否定了的东西并不是牛顿力学的客观内容，而只是人们对它的适用界限的规定(这个规定是错误，不是真理)；从后一个方面说来，牛顿力学的内容也并没有被否定，只不过是发现了它还不够深刻，因而把它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而已。祚麻同志也说：“在速度较缓慢的条件下，牛顿力学仍然作为客观真理而被保留了下来。”^①这不就等于说作为相对真理的牛顿力学并没

有全部地或者部分地被否定么？

由此可见，相对真理可以部分地被否定的说法，不仅在逻辑上说不通，而且也不符合科学史上的真实情况。

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 和相对性

祚麻同志对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看法，是同他对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看法有密切联系的。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既有绝对性(或确定性)的一面，又有相对性(或不确定性)的一面。这是我们都承认的基本原理，是没有争论的。可是，如何理解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呢？这就有分歧了。祚麻同志对实践标准的相对性是这样说明的：

“实践标准的相对性，是说：科学研究工作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确证只是相对的，它只能在一定范围，一定的近似程度内，一定的意义上，确切地证明某一理论是正确或是错误，或理论中的哪一部分是正确，哪一部分是错误。”^②

“科学理论经由实践检验并证明它为正确，而在以后又要加以修改的这种事实，也就是实践标准的这种相对性——完全是历史上合乎规律的现象。”^③

“由此可见，对于那些已有大量科学实践证明它为正确的理论，我们仍应持批判的态度”

① 《红旗》1962年第2期，第23页。

② 《红旗》1962年第2期，第22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下同。

③ 《新建设》1962年11月号，第40页。



度。問題在於人們的實踐總是具體的實踐，隨着實際生活的發展，盡有可能出現新的實踐條件，在這種新的實踐條件下，原來的理論就可能顯得陳舊。因此，我們在科學工作中必須看到實踐標準的這種相對性，不應抱迷信的態度。”^①

我認為這樣來說明實踐標準的相對性，實際上就抹煞了實踐標準的絕對性。為什麼呢？因為祚麻同志雖然宣稱實踐能夠“確切地證明某一理論是正確或錯誤，或理論中哪一部分是正確，哪一部分是錯誤”，但是他卻又認為被實踐證明它為正確的理論在以後要加以“修改”。應當指出，這裡所說的“修改”，並不是通常所說的深化或發展的意思，而正是部分地被否定的意思。因為第一、用理論的深化和發展來說明實踐標準的相對性是文不對題的，實踐標準所涉及的是理論是不是真理的問題，而不是真理深刻到什麼程度的問題；第二、如前面分析過的，祚麻同志是主張相對真理可以部分地被否定的。可見，這裡所說的“修改”就是部分地被否定的意思。但是，既然被實踐證明為正確的理論中竟然有一部分在以後會被否定，會被重新證明為不正確，那麼所謂實踐能夠“確切地證明”云云，豈不成了空話嗎？“確切”豈不實際上成了不確切嗎？

如果再看看祚麻同志對於實踐標準的絕對性的說明，問題就更加清楚了。在他看來，實踐標準的絕對性表現在：

“凡是經過實踐檢证的科學理論都是客觀真理，包含有絕對真理的成分。特別是那些已有大量的科學實踐證明為正確的理論，所包含的絕對真理的成分也就越多。這種已經有大量實踐為基礎的絕對真理的成分，是

不會隨着科學的發展而消失的。”^①

“在實踐檢驗過的相對真理中間總是包含有絕對真理的成分。在相對真理中間哪一部分是絕對真理，實踐檢證過的真理所適用的範圍究竟有多大，所有這些都是歷史地有條件的。但是在相對真理中間，只要它為實踐檢驗過，那末在它們中間，總是包含有絕對真理的成分。而在科學的進一步的發展中，這種絕對真理的成分就要作為寶貴的財產而繼承下來。自然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將能為我們指明哪些是完善，而哪些是不完善的真理。”^②

這些話是很費解的。既然承認“凡是經過實踐檢證過的科學理論都是客觀真理”，那就是承認凡是經過實踐檢證過的科學理論都是同客觀對象相符合的了。這當然是完全正確的。但是緊接着又說，這樣的客觀真理當中僅僅有一部分不會“消失”，那就是說還有一部分會“消失”了。加在一起就是說：經過實踐檢驗過並且證明其為同客觀對象相符合的認識中有一部分將被新的實踐證明為同客觀對象不相符合！這怎麼好理解呢？還不止此。他還認為“相對真理中間哪一部分是絕對真理”也是“歷史地有條件的”，只有等待“科學的進一步發展”來為我們“指明”。這就是說，要想在一個確定的歷史條件下把相對真理中會“消失”的部分和不會“消失”的部分加以“指明”也是不可能的了。按照這樣的邏輯講下去，豈不是只好承認我們永遠無法確切地斷定一種認識是不是同對象相符合嗎？這怎麼能夠說明實踐標準具有絕對性、確定性的一面呢？

① 《紅旗》1962年第2期，第23頁。

② 《新建設》1962年11月號，第43頁。



祚麻同志对实践标准的绝对性还有一个更具体的说明。他说：

“当我们对前人的工作进行批判的审查时，必须对它的实践根据有充足的估计。假如我们的科学实践仍然处在前人的实践所达到的范围以内，那就不可能期望在这个范围内推翻任何自然科学上的定律（除非前人工作包含有错误）。”①

乍看起来，这段话好像是更强调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可是，仔细分析一下就有问题了。因为他说的是“假如我们的科学实践仍然处在前人的实践所达到的范围以内，那就不可能期望在这个范围内推翻任何自然科学上的定律。”那么试问：当我们的科学实践超出了前人的实践所达到的范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期望在这个范围（即“前人的实践所达到的范围”）内“推翻”自然科学的定律呢？按照祚麻同志的逻辑，当然是可以的了。但是，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科学史表明，即令科学实践超出了前人实践的范围，也决不可能在原来的范围内推翻自然科学的定律（假如前人的工作没有错误的話）。例如，尽管今天的科学实践超出了牛顿时代的人们所能达到的范围即宏观低速现象的范围，我们也没有在这个范围内推翻牛顿力学的定律（至于在这个范围以外，那又根本谈不到什么“推翻”牛顿力学定律的问题了）。可见，祚麻同志的这段话，仍然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述了“相对真理可以部分地被否定”的说法。它不但没有说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而且恰恰抹煞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

所以，我认为按照祚麻同志对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解释，是很难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进行无情的斗争的。

为什么祚麻同志作出了这种难以令人同意的解释呢？这可能是由于他没有把这样两个问题区别清楚：（一）一个认识是不是真理？（二）如果是真理，那么它的适用界限在哪里？

一个认识是不是真理，就是说，它有没有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内容，它是不是同一定的客观对象相符合？这个问题，实践能不能确切地证明呢？我认为是能的。恩格斯说：“当我们按照我们所知觉到的任何事物的属性来利用这一事物的时候，我们同时就使我们感性知觉的真实性或虚假性受到准无差错的考验。”② 列宁说：“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的符合。”③ 毛泽东同志说：“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即“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的问题。——引者），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④ 这里说的正是“准无差错”，正是“证明着”，正是“完全解决”，没有任何保留，任何“但书”。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实践连认识同对象是否符合这件事情也不能确切地证明，那它就根本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否认了这一点，就等于否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牛顿力学是不是同一定的客观规律性相符合，是不是客观真理，这件事情，实践是能够而且已经“准无差错”地、“完全地”

① 《红旗》1962年第2期，第24页。

② 《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1页。

③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9页。

④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1页。



解决了的，是不会被将来的任何情况所改变的。在这个问题上根本谈不上“仍应持批判的态度”和“不应抱迷信态度”的问题。这正是实践标准的绝对性或确定性的一面。

但是，如果一个认识是真理，那么这种真理所反映的客观规律性存在于何种范围之内呢？它的适用界限应该怎么划法才合乎实际情况呢？这个问题，实践是不能确切地证明的。列宁说：“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①正好说明了这种事实。我们当然毫不怀疑，每一次这样的“扩张”或“缩小”，只要是以实践为根据的，总是前进了一步，总是使人们对真理的适用界限的规定更接近于实际情况；但是，无论何种条件下的实践，都不能保证“准无差错”地、“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都不能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扩张”或“缩小”的情况。例如我们今天对牛顿力学的适用界限的规定，当然要比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产生以前的那个旧的规定更接近于实际情况；但是，我们也仍然没有充分的根据说我们今天的规定就是“最终的”、永远不会再变动了的规定。如果在今后科学实践的触角伸进了我们今天还不知道的新的领域，以致将来的人们有必要根据新的实践材料对我们今天所规定的界限再作一些“扩张”或“缩小”，也并不是不可能的。这正是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不确定性的一面。

正因为祚麻同志把认识是否真理的问题同真理的适用界限问题混淆起来了，因此他就不能正确地说明实践能够确切地证明的是什么，不能确切地证明的是什么。例如，当他以普洛特假说的变化史和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的发展史为例来证明“科学理论经由实

践检验并证明它为正确，而在今后又要加以修改”的说法时，就表明了这一点。其实，普洛特假说当中那些后来被“修改”了的东西并不是真理，而是错误；在牛顿力学到相对论的发展过程中被“修改”了的并不是牛顿力学的客观内容，而仅仅是人们对它的适用界限的错误的规定。这些东西都不是“经由实践检验并证明它为正确”的东西，而恰恰是从来没有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东西。这些例子正好说明了：凡是真正经过实践检验过并且证明为正确的东西，是只会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而决不会被推翻的。

* * *

补记：本文写成后，又读到祚麻同志发表在《红旗》一九六四年第十期上的《再谈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践标准问题》一文。祚麻同志在这篇答辩文章中所做的主要工作是：（1）重申他过去的观点；（2）进一步否认自己认为相对真理包含错误和相对真理可以部分地被推翻；（3）指摘杜雷、吴俊光同志和我“把认识中的不精确、不完善和认识中的错误混为一谈”，“取消了真理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概念”，等等。我认为，（1）祚麻同志过去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仍然并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明，相反，论据和论点之间的矛盾比前几篇文章更多了；（2）他的关于相对真理不包含错误以及相对真理不可能部分地被推翻的申明同他的基本观点是互相矛盾的；（3）他对我们的上述指摘是缺乏根据的。关于这些问题，我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再谈谈自己的意见，同祚麻同志作进一步的商榷。

①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4頁。

